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

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6 年 9 月



未来已来，智在人为

The Future is Present， Wisdom Driven by Actions

目录

序言（一） ····· **02**
序言（二） ····· **04**
前言 ····· **06**
一、 深圳实践的现实背景 ····· **08**
（一）困境：“案件总量大”与“定分止争难”的现实挑战 ····· 08
（二）契机：技术突破与政策供给双重驱动 ····· 09
（三）基础：无纸化办案、在线诉讼服务与知识管理 ····· 09
二、 深圳实践的系统成果 ····· **13**
（一） 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场景模块 ····· 13
（二） 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智能体应用 ····· 24
（三） 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自成长性 ····· 29
三、 深圳实践的创新亮点 ····· **31**
（一） 首个全流程系统性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 ····· 31
（二） 首创司法领域专属智能体驾驭工程 ····· 33
（三） 首次在生产环境落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安全体系 ····· 37
四、 深圳实践的应用成效 ····· **40**
五、 深圳实践的经验分享 ····· **43**
（一） 上级法院、地方支持的资源集聚 ····· 45
（二） 把握方向、严守底线的制度先行 ····· 46
（三） 业务牵引、双跨融合的研发模式 ····· 47
（四） 理念转变、深度应用的生态培育 ····· 50
六、 数智原生的司法愿景 ····· **53**
（一） 全球司法工作的长期挑战和时代机遇 ····· 53
（二） 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 ····· 55
（三） 建设智慧便捷的在线诉讼服务体系 ····· 60
（四） 拓展司法人工智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功能 ····· 64
结 语 ····· **66**
附录 1： 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 V2.0（2026 年 9 月） ····· **67**
附录 2： 术语定义 ····· **82**
附录 3： 大事记 ····· **87**

序 言（一）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对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带来深远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按照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工作部署，深圳政法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强政法智能化建设，探索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执法司法新方式。深圳法院建成全球首个全流程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形成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规则体系，提供了在有限司法资源条件下提升司法能力的地方实践样本。

一、有效缓解司法案件持续增长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案件数量持续攀升、司法资源供给存在缺口、审判办案压力持续加大，已成为现代司法体系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和现实挑战。深圳作为经济大市、外贸大市、超大型城市，案件体量庞大、司法需求多元，传统审判模式已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深圳法院立足先行示范的使命定位，抢抓大语言模型实现历史性技术突破的时间窗口，主动以人工智能赋能司法寻求破局，打造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系统覆盖立案、阅卷、庭审、文书制作等办案全链条核心环节，集智能辅助、数据支撑、流程监督、自主迭代于一体，提升审判质效，纾解人案矛盾，助推审判模式革新。目前，相关系统功能已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一张网”统一办案办公平台，在全国多家法院开展试运行，配套形成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规则体系获得国内外司法界广泛认可。

二、有效推动司法责任制全面准确落实

司法权本质上是判断权，判断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无论技术演进到何种阶段，法官的专业判断与司法经验都不可替代，裁判权只能归属于法官，司法责任亦由法官最终承担。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严格恪守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的核心定位，由法官完整把控系统信息来源、决策过程和生成结果，从源头上防范“机器判案”与“算

法黑箱”风险。法律条文、参考案例等权威数据全部取自最高人民法院知识库，不直接由大模型生成，有效规避大模型“幻觉”带来的信息失真风险。系统推动办案决策流程标准化落地，各节点实现智能检索、自动提示、辅助研判，全部风险节点均可追踪可回溯。系统始终把安全作为生命线，采用互联网物理隔离机制，对数据流转实施实时监控与风险预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可以说，该系统是在人工智能司法新场景下，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生动演绎。

三、有效推进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积极落实“人工智能 +”行动，促进科技创新同政法工作深度融合，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从矛盾纠纷智能排查、风险智能预警，到城市精细化治理，科技已成为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落地运行，为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深圳将持续深化现代科技在社会治理多场景的研发应用，推动技术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守正创新，笃行致远。《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体现了现代科技与司法实践融合应用的探索与尝试，彰显了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水平的信心与决心。我们期待能与更多同行者携手共进，为司法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是为序。

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

2026 年 8 月

序 言（二）

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实践真知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早在 2018 年 10 月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用 4 个“战略”强调其重要性：“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牵引作用，也为我们在政务领域探索人工智能应用指明了方向。

2023 年 10 月，国家数据局挂牌成立以来，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建设以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探索形成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5+3+1”工作体系，而其中的“1”就是突出“数据要素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一个重点。可以说，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已逐步成为驱动数字时代发展的两大核心引擎。

深圳作为全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全球竞争力持续巩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当人工智能浪潮袭来，深圳既有深厚积累，也面临政务场景中路径不明、标准缺失、算力难测的现实挑战。如何让新技术真正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作用——既推动服务和治理手段创新，又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应用场景，成为政务服务和数据工作统筹部门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2022 年 11 月，ChatGPT 的发布引发全球关注，大模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泛化能力和内容生成能力。彼时，大模型技术还在极早期，在政务领域深度应用既无成熟路径可循，也缺乏可参照的落地样板。“该怎么用、能发挥什么作用”，都没有现成答案。就在这时，深圳法院率先迈出步伐，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领域蹚出一条成功之路。这期间，我们也敏锐捕捉到其中的价值，通过建立常态对接机制，在项目方案修编、算力服务、数据协调等方面全力做好保障。2024 年 3 月，人工智能辅助审判试点初步见效——外观设计专利审判场景中，同等案件量下，审理团队从 20 名精简至 8 名，其中法官从 8 名降至 2 名，

试点效果令人振奋。2024 年 6 月 28 日，该系统在全市民商事案件中全面推开，成为人工智能辅助审判从试点走向全面应用的里程碑节点，逐步覆盖占深圳法院总案件量绝大多数的民商事案件，数千名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同步使用，大规模真实应用形成“反馈飞轮”，模型质量迅速跃升。同年 12 月底，行政、刑事案件模块陆续上线，实现主要案件类型全覆盖，为全国政务领域大模型落地提供了“深圳样板”。

技术浪潮奔涌向前，深圳法院的探索从未止步。我们也持续跟踪技术演进，与深圳法院保持高频互动，共同解决迭代升级中遇到的数据治理、算力扩容、模型调优等问题。DeepSeek 开源后，深圳法院率先启动对接华为昇腾算力体系，2025 年底“自主智能体 + 技能工具”的智能体应用模式涌现后，又探索智能体与专属驾驭工程协同的司法应用新范式。从闭源探索到开源普及，再到智能体渗透，每一轮技术浪潮，深圳法院都站在创新和应用的第一线。

回顾这段历程，深圳法院的探索之所以珍贵，在于三个鲜明特质：一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半年内在单点场景见到实效；二是业务牵引的系统方法。始终围绕“公正与效率”核心目标，形成“业务牵引—组织保障—技术支撑”全链条推进方法，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落地路径；三是持续迭代的进化能力。技术在变，但“用新质生产力解决治理真问题”的主线不变，让探索始终走在行业前沿。深圳法院的实践，本质上是用新质生产力破解了传统条件下长期难以解决的治理难题。这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通过人机协同重塑司法生产方式，让法官更专注于审判核心职能。

一花引来万花开。2024 年 5 月起，我们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召开推广会议、编制标准规范等方式，推动深圳法院的创新模式向全市复制推广。全市政务人工智能也从“一枝独秀”走向“全面开花”，已在政务服务、民生诉求、交通治理、城市管理、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落地见效。

本白皮书系统总结深圳法院三年来的探索历程，全景式呈现政务大模型从 0 到 1、从 1 到 N 的实战经验。我们希望这份来自一线的探索，能为更多城市和政务部门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让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的融合势能，在更广阔的治理场景中充分释放。

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6 年 8 月

前 言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深刻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治理模式，也加速推动法治建设形态发生深刻变革。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提出，深入拓展数字化司法应用场景，推动智能化司法应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审判流程、诉讼规则、司法模式变革。《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 年）》提出，深入拓展数字技术司法应用场景，加强审判领域技术自主创新，强化智能算法、大语言模型、数字模型等技术应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办案、集约事务、防控风险、方便诉讼等作用，打造安全可靠、协同高效、普惠便捷的数字技术司法应用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驱动审判流程、诉讼规则和司法模式变革。

深圳是一座创新型城市，高科技企业林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市场经济高度活跃，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司法需求多元旺盛。对深圳法院而言，“案件总量大”与“定分止争难”的压力与挑战尤为突出，迫切需要以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实现破局、突围。2024 年 6 月，深圳法院建成全球首个体系性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逐步覆盖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领域，全流程辅助办案，形成深度应用格局，有力提升了司法公正保障水平和审判效率，实现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由蓝图愿景到落地实践的历史性跨越。与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模式相匹配，深圳法院率先构建类型化案件专业化审判机制，探索了人机协同模式下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新路径，也为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系统在建设和应用过程中探索积累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规则体系，凝练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被国内外司法界广泛认同。

时代潮流催人奋进，改革创新任重道远。三年的实践和成效充分表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安全用于司法领域，更能有效驱动审判流程、诉讼规则、司法模式变革。人工智能与审判工作深度融合，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破解案多人少矛盾、促进审判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路径，更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支撑。

为系统总结深圳法院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创新实践、固化改革成果、提炼制度经验、研判发展趋势，特编制本白皮书，旨在总结实践规律、凝聚发展共识、共享先行经验，为深化数字法院建设、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借鉴。



一、深圳实践的现实背景

（一）困境：“案件总量大”与“定分止争难”的现实挑战

>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
> ——习近平

世界司法实践表明，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度转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社会矛盾纠纷总体呈现多发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深化，法治意识、权利意识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进入诉讼渠道、涌入法院。

中国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和工作目标。在诉讼制度设计上，实行较低的诉讼门槛和诉讼费标准，不强制当事人聘请律师，在诉讼周期方面有着严格规范的期限规定，致力于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高效、便利的司法服务。然而，案件总量持续高位运行，对中国法院司法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提出了严峻挑战，“案件总量大”与“定分止争难”成为法院工作最突出的困难和挑战。

深圳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超大型城市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中国金融、科创、制造、物流等产业的中心枢纽城市。截至 2025 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 1824.85 万，实际管理人口超 2200 万，商事主体达 465 万户，经济活动高度活跃。然而，司法资源的供给难以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司法需求增长完全匹配，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与司法资源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已从阶段性压力演变为结构性难题。

在传统审判模式下，法官需要逐页阅读卷宗、手动梳理证据事实、逐字撰写裁判文书。大量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法官的主要精力，导致核心争议研判时间被严重挤压。审判工作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与日俱增，法官长期超负荷工作。而对虚假诉讼等风险行为的识别，高度依赖法官个人经验，系统性筛查能力不足。同时，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程序节点管理、质量保障、异常预警等环节缺乏智能化辅助手段，问题往往在事后发现而非事前预警。

原有的司法生产工具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如何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公众提供更加公正、高效、便利的司法服务，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契机：技术突破与政策供给双重驱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全文（中英文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2-12-09 10:07:58

法发〔2022〕3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动人工智能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司法管理和服务社会治理等工作的深度融合，规范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提升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实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 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
>
> ——习近平

2022 年 11 月，大语言模型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展现出的自然语言理解、逻辑推理和文本生成能力引发全球关注。大语言模型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潜力迅速成为热点，它能阅读和理解篇幅较长的法律文书、归纳案件事实、检索相关法律条文、生成结构化的裁判文书初稿，这些能力与司法审判中的事务性工作高度契合。然而，通用大语言模型在司法这一高严肃性领域的应用也面临“幻觉”（即生成看似合理、实则不可靠内容的现象）、“黑箱”（推理过程不可解释）和安全性等严峻挑战。2022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发布《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体系，明确了安全合法、公平公正、辅助审判、透明可信、公序良俗五项基本原则，强调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的参考，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这一文件为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划定了规则框架，也为地方法院的探索实践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基础：无纸化办案、在线诉讼服务与知识管理

>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
> ——习近平

案件材料电子化和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是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前提和基础。深圳法院的人工智能应用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建立在逾六年的数字化积累之上，经历了从电子化到智能化、从在线服务到智能辅助的渐进发展过程。自 2017 年起，深圳法院逐步建立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推广无纸化办案模式。2019 年上线移动端在线诉讼平台，推广全方位在线服务。至 2023 年，深圳法院已形成覆盖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的电子化办案基础，积累了海量的结构化司法数据和成熟的在线服务渠道。这些基础为实现“从电子化到智能化”的跨越提供了现实条件。



1. 电子卷宗与全流程无纸化办案

2017 年，深圳法院启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建设，率先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开展试点，实现诉讼材料的自动扫描、编目和结构化处理。2018 年，深圳两级法院推广无纸化办案模式，打通电子卷宗系统与调解、送达、执行等平台，实现案卷全流程随案生成、线上流转。2022 年，深圳法院“电子文件单套归档和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试点通过国家档案局验收，实现仅以电子形式归档的单套归档模式，标志着从纸质卷宗向电子卷宗的全面转型。六年的无纸化办案实践，使深圳法院积累了海量结构化司法数据。

案件信息、证据材料、庭审笔录、裁判文书均以电子化形态留存，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数据原料和实践基础。

2. 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



2019 年 11 月，深圳法院上线移动端诉讼服务平台“深圳移动微法院”。该平台是基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移动在线诉讼平台，无需安装独立软件但需实名注册认证，立案后即可通过手机完成审理、调解、送达等全部诉讼活动，为当事人和法官提供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平台为审判人员与诉讼参与人组建即时消息群组，诉讼行为的发起与反馈均在群组内直观呈现，全程留痕并支持一键归档。依托这一便捷入口，平台为当事人提供案件查询与进度跟踪、在线提交诉讼材料、在线庭审、电子送达、在线调解等全流程服务，同时针对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士实现跨境在线身份认证，并为涉及众多受害人的案件提供在线退款账户登记与核验功能。

平台上线以来持续更新迭代，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不断拓展和深化“司法为民”数字服务。2025 年 10 月，平台升级为“深圳数字法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流程在线审理服务：在庭前阶段，通过智慧引导，辅助当事人在线提交结构化数据，完成案件基础信息、诉辩意见信息填报，在线进行举证和质证，实现数据的标准化采集与固定，充实庭前准备工作，为后续集中高效审理夯实基础。在审理阶段，为选择并符合在线审理条件的诉讼参与人提供在线审理服务，审判人员通过法院专网端登录，与诉讼参与人使用的互联网小程序端实现安全互联，在线进行调查询问、线上开庭。人工智能为在线审理提供辅助，对庭前阶段收集到的结构化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将提取出的关键事实、争

议焦点、法律依据等提供给审判人员参考。通过全流程在线审理，庭审更聚焦、案件审理周期更短、当事人诉权表达更充分深入、司法获得感成效更足。

截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深圳数字法庭”实名注册用户近 300 万，累计办理案件超 490 万宗，在线庭审超 27 万次，电子送达文书超 5908 万份，全市法院超过 90% 诉讼材料的收发和送达通过线上服务完成，大幅节省当事人诉讼成本，受到当事人和律师群体的广泛认可。更为重要的是，举证质证、发表意见、庭审、调解、送达等全流程诉讼行为均可通过数字法庭线上进行，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证据材料均以电子化形式呈现，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3. 权威知识库和实务知识管理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动案例库、法信等权威知识库建设，建设形成了规范统一、体系完整、持续更新的法律知识“国家库”，实现了法官办案所需的法律法规、条文释义、裁判规则、权威案例、法律观点的全要素覆盖，立法、司法、案例、学理的体系化贯通，构建了可通过专网为全国法院提供统一服务的国家级知识底座。正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持续治理下，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从一开始即具备了国家级的法律知识底座，在知识来源上实现了“权威、统一、完整、实时”的四重保障，为后续垂直领域大模型训练和权威知识智能化应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国家级基础设施。

与此同步，深圳法院也在司法实务层面持续完善知识管理机制。自 2021 年起，深圳法院持续组织审判业务专家将办案实务中的知识成果进行全面转化，持续编纂完成了 100 多个案由的类案审理指南。这一治理历程并非简单的文本汇编，而是将散落在个案经验中的审判智慧，经过“采集、沉淀、评审、转化、更新”的完整链条，固化为细颗粒度、高标准化、强共识性的知识管理机制，促进办理质效提升和裁判标准统一。每一类审理指南都凝结了该领域法官的共识性审判方法、审理思路与业务标准，且具备灵活更新、随实践迭代的能力。这一“来自实践、反哺实践、规范实践”的知识管理成果，既指引着深圳法官的日常办案实践，锻造了各领域专业化的深圳法官队伍，也全面固定了贴合司法实务场景的共识性语料与知识工具，成为后续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所依托的司法实务知识本体基础。

二、深圳实践的系统成果

在政策引导、技术突破和应用基础等多重有利因素的交汇下，探索实践得到了深圳市委政法委和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大力支持。2023 年 5 月，深圳法院谋划开展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建设，组织专家法官和技术人员成立专项研发团队，开始探索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审慎融合。探索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程给予了悉心指导，确保方向不偏。2024 年 6 月，深圳法院全面建成首个全流程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启用首个司法审判垂直领域大模型，实现了从电子化办案到智能化辅助的关键跨越。系统历经 3 次重大架构版本迭代、500 余次敏捷更新，并与时俱进引入智能体技术，逐步覆盖了民事、行政、刑事等主要案件类型，实现全流程人工智能辅助办案，形成深度应用格局。

（一）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场景模块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贯穿案件审理的全流程，覆盖从立案审查到文书草拟的六个司法审判核心应用场景，为法官提供全方位智能化辅助。

1. 智能立案审查





立案是司法服务的第一道关口。在中国诉讼制度中，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需对起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包括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审查诉讼请求是否明确、判断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范围等，并对重复起诉等滥用诉权情形进行审查。传统模式下，立案审查高度依赖人工逐项核对：担负立案审查职责的立案法官需要逐页翻阅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证据清单、身份证明等材料，比照法定标准手动进行核查。这一过程不仅耗时长且容易导致标准不统一。

由于立案审查相比其他审理环节较为简单，因此，深圳法院优先选取该环节作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试水”工程，2024 年 1 月便率先研发应用了智能立案审查模块，将立案审查标准统一编排为可执行的智能化应用规则，实现标准化、自动化审查。该模块依托智能文档结构化、语义模糊匹配和上下文分析推理等技术，对当事人提交的起诉材料进行自动识别、分类和结构化处理。系统可依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辅助对材料一致性、及时性等 35 项立案标准进行全面审查，快速检验起诉材料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辅助审核案件管辖权。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一次性登记立案，对需要补正材料的案件一次性告知补齐。至今，该模块已辅助审查超过 130 万宗申请，有效提升了立案材料审查和材料补正指引的精确性，不仅大幅缩短了审查周期，还显著减少了人为疏漏和标准偏差。

公众可能会担心：人工智能审查立案，会不会因为技术误判而拒绝当事人的合法诉求？对此，“系统辅助、人工把关”的设计原则可以消除这方面的顾虑。系统完成初步审查后，所有立案决定仍由法官确认。对于系统标记为“需补正”的案件，立案法官会进行二次人工审核，确保不会因技术判断偏差而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系统审查标准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编制，并随法律法规更新同步调整，避免因规则滞后导致审查偏差。

2. 智能阅卷核验



阅卷是法官掌握案情的基石，也是最耗时的辅助工作之一。在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往往数量庞大。例如，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可能涉及数十份合同、数百页微信

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卷宗动辄数千页。如果当事人没有律师代理，受制于诉讼能力的差异，有时提交材料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不足，会给法官阅卷带来更多负担。传统模式下，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需要逐页翻阅卷宗，手工摘录关键信息，如当事人名称、合同金额、签订日期、争议条款等，再将其整理成阅卷笔记。这一过程耗时漫长。一位法官形容：“光是把几百页卷宗翻一遍，把关键信息抄下来，就要花掉一整天。”更令人头疼的是，手工摘录容易出现遗漏或笔误，而一旦关键信息在阅卷环节被遗漏，可能在后续庭审和裁判中造成事实认定偏差。此外，法官还需要在多个系统之间反复切换，查询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企业的工商登记状况、劳动仲裁记录等外部数据，进一步增加时间成本。



深圳法院研发应用的智能阅卷模块，将阅卷过程从“逐字录入”升级为“一键核查”，该模块具备卷宗整理、信息定位和信息归纳等核心功能：可对各类诉讼材料进行自动编目和分类筛选，自动提取基础信息、诉辩意见和证据质证等案件核心信息，并将提取的结构化信息与原始材料一一对应、同屏比对。法官在查看系统智能提取的信息时，还可以同时看到其对应的原始材料，并且一键点击，即可溯源核实。同时，系统还通过可控的大数据共享，让法官更加全面地了解与当事人和案件有关的外部信息。

法官无需在多份材料、多个系统间反复翻阅查询，即可获取准确的案件信息。法官在阅览后，仅需核对、修订和补充，将原本耗时一整天的工作压缩至数十分钟。更重要的是，系统对全部材料进行无遗漏扫描和提取，有效避免了人工翻阅可能产生的信息遗漏，为后续事实认定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在阅卷过程中，最大的技术隐患在于：人工智能提取信息会不会出错，比如把合同金额提取错了，或者张冠李戴，把 A 当事人的信息归到 B 当事人名下？对此，系统采用了“多源校验”“同屏比对”机制，系统全面提取案件材料中所有的相关信息来源，并依据设定的业务规则进行筛选和校验，为法官优先展示人工智能认为最为准确的数据。同时，智能提取的每一条信息都可溯源至原始材料的具体位置，法官可以一键跳转到原始材料进行核实。这意味着系统不是“黑箱操作”，而是全程透明、可追溯的。此外，系统提取的信息仅作为待确定数据，法官在阅览后需要进行核对、修订和补充，最终确认权始终在法官手中。即便系统提取有误，也会在法官核对环节被发现并纠正。

3. 智能庭审辅助





庭审是审判活动的核心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而影响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例如，民事案件通常开庭一至两次，法官需要在有限时间内主持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多个环节。传统模式下，庭前准备往往较为粗放：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翻阅卷宗后，凭借个人经验梳理庭审要点，容易出现遗漏。庭审中，当事人可能突然变更主张或当庭改变此前的事实陈述，法官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可能无法及时应对，导致庭审节奏被打乱，甚至重复开庭。一位法官坦言：“最怕庭审中当事人变更事实逻辑，打乱整个审理节奏，一旦缺乏准备就很难一次性查清所有法律事实，有时候不得不另择日期再次开庭。”重复开庭不仅延长了审理周期，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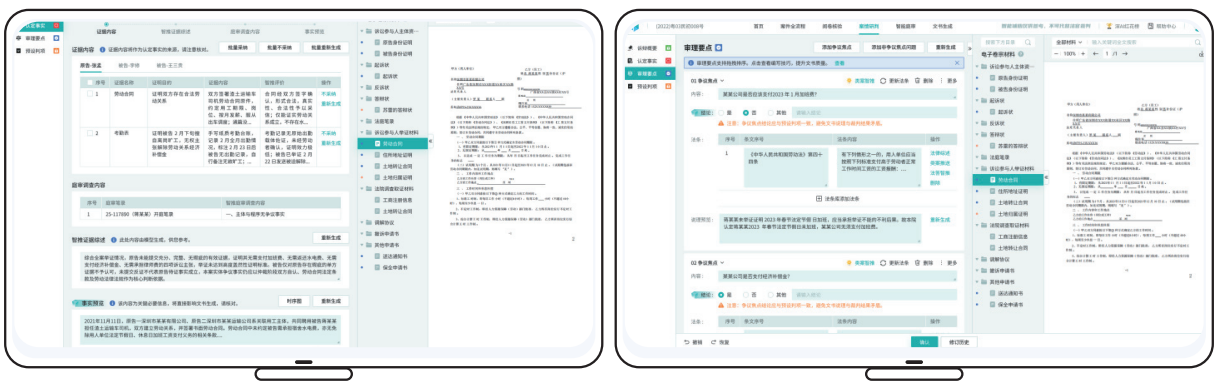
深圳法院研发应用的智能庭审模块，贯穿庭前准备、庭中审理和庭后整理全过程。庭前，系统协助法官根据案件类型的审理思路和本案的诉辩意见，快速梳理庭审中需要关注的审理要点，同时对当事人陈述进行一致性和逻辑审查，整理双方均无争议的案件事实，针对需要查明的问题提出贴合案情的“剧本式”提问参考，并辅助生成结构化的

庭审提纲。庭审过程中，如遇突发状况，系统可为法官推送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处理指引。庭后，系统可快速归整庭审笔录文件并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出核心争议焦点和事实调查情况。

该模块将庭前准备从粗放式升级为精细化。法官在庭前即可全面掌握争议重点，有效应对“证据突袭”“前后反言”等突发情况。在实际审理中，法官运用庭审提纲进行引导提问，庭审驾驭能力更加精湛，庭审节奏更加紧凑，庭审重点更加聚焦。许多案件得以当庭促成和解或明确裁判方向，显著提升了庭审的实质性和严肃性。有限的庭审时间得到最大化利用，推动“一庭终，纠纷解”目标的实现，减少重复开庭和程序空转。一位法官形容该模块“就像是给每个法官配备了 24 小时工作的助手，系统在开庭前即为其完成了一场高质量的‘庭审预演’，包括提示庭审焦点、每个焦点需核查的关键问题，使法官在踏入法庭前就对案件全貌了然于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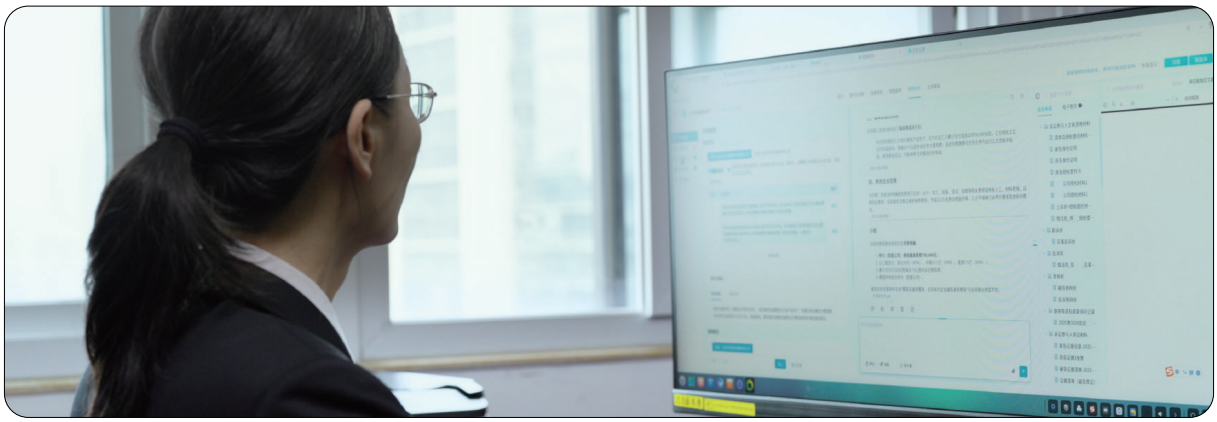
公众可能担心：人工智能会不会在庭审中替代法官提问，甚至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对此，系统的设计明确将系统定位为“辅助工具”。系统提供的是“提问参考”而非“提问指令”。法官可以采纳、修改或完全不用这些建议，庭审的引导权和决策权始终由法官掌握。系统在庭审中推送的法律规范和应对策略，也只是供法官参考的信息支持，不构成对案件裁判的任何倾向性意见。庭审过程的多样性、实时性、鲜活性仍然保留，当事人的诉权不会被半分削减或剥夺，庭审的固有价值不受技术介入的影响，反而更为彰显。

4. 智能案情研判



案情研判是审判工作中最核心、最考验专业素养的环节。法官需要从海量卷宗材料中对每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评价，由点及面梳理出案件事实，

在此基础上归纳争议焦点，逐一分析论证，最终形成裁判结论。传统办案模式下，这一过程高度依赖法官个人的专业素养与经验，因此，耗时久、消耗大。面对证据材料繁多、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法官需要反复翻阅卷宗、记录比对证据之间的矛盾与关联，容易出现信息遗漏或关注偏差。此外，不同法官的知识储备和检索能力存在差异，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可能因关注的信息不一致而导致裁判尺度出现偏差，产生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的“类案不同判”的问题。



深圳法院研发应用案情研判模块作为系统的中枢，承载协助法官认定事实、审查争议焦点、撰写说理、确认判项等关键决策性工作。该模块包含四个核心部分：

（1）诉辩概要：系统同步展示经审核确认的诉辩意见，生成最终诉请，并展示诉请变更情况和答辩摘要。

（2）事实认定：系统辅助提炼证据主要内容，结合证明目的和质证情况梳理证据综述，提取庭审事实调查内容，结合法官对证据的采信情况，辅助融合整理案件事实。

（3）审理要点：系统依托案件事实和诉辩意见自动梳理案件争议焦点。法官可对争议焦点进行增删修改，但实体结论必须由法官自主选定。使用过程中，系统实时为法官提供权威法律知识服务，智能推送与当前争议焦点高度匹配的法律法规、参考案例和法律解读等。法官确认争议焦点内容后，系统随即根据法官的结论，辅助撰写相应的争议焦点说理，并展示推理过程。

（4）确定判项：法官需对每项诉请做出最终裁判结论，系统根据确认的诉请和案情辅助生成预设判项，并推送裁判依据。

该模块有效提升了事实认定的准确度：系统对全部证据逐一提炼主要内容、评价证明力并形成综合评价，帮助法官系统性地审视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面对证据材料繁多、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系统能够快速定位证据之间的矛盾与缺口，提示法官关注可能被忽略的关键事实，有效减少因信息遗漏导致的事实认定偏差。同时，系统促进了裁判说理质量提升和裁判标准统一。无论案情繁简，系统均会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分析，提示法官一一回应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通过在每个决策点自动推送权威知识和类案参考，系统帮助不同法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获得一致的信息输入和参考基准，有效减少因个人知识储备和检索能力差异导致的裁判尺度偏差，推动同类案件裁判标准趋同。

案情研判是涉及司法裁判核心决策的环节，该模块必须回应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最大的担忧：人工智能会不会替代法官作出裁判结论？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在知识和信息上的“幻觉”而导致错误裁判？对此，系统构建了多重防线：

第一，划清责任边界。即系统推送分析，法官作出决策。在研判环节，法官可对系统赋能的结果进行增删修改，并且每项实体结论均需法官自主决定。系统只提供素材和分析，不作出任何最终结论。这一机制确保了司法责任不因技术介入而模糊。法官对每一项决策负责，系统的作用仅是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撑和更精准的知识推送。

第二，全程留痕。系统推送的每一条分析、法官作出的每一个决策点都有完整的操作记录，法官的每一次确认、修改或拒绝都被系统记录在案，确保决策过程可追溯。

第三， 权威知识约束，从源头杜绝人工智能产生知识性“幻觉”编造法律依据的风险（详见下文“智能知识检索”部分）。

5. 智能文书草拟





裁判文书是审理结论的法定载体，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司法权威性和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等）制定了全国统一、规定严格的格式规范和写作要求，需包含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事实认定、说理论证和判项主文等多个部分。传统模式下，法官需要手动完成文书撰写的全过程，从格式排版、信息录入到文字校对，大量时间被消耗在机械性的事务工作中。一份复杂的判决书，法官可能需要数天才能完成初稿。其中，信息录入占据了不少时间，而真正需要法官投入精力的说理论证部分反而被压缩。此外，手工撰写容易出现文字错误、格式偏差和信息遗漏等问题，影响文书质量，而校对仍要消耗法官的精力。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果法官的时间精力被事务性工作消耗，导致说理部分不够翔实严谨，以败诉方为代表的当事人群体，可能感到自己的主张未被充分重视，进而影响服判息诉效果。

深圳法院研发应用的智能文书辅助生成模块，依据法官在各环节确认的关键信息，包括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和裁判依据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文书规范和写作样式，辅助生成结构完整、格式规范的裁判文书初稿，覆盖文书的事实认定、说理论证和判项主文等核心部分。其中，说理部分可基于法官确认的争议焦点进行针对性撰写，逐一回应当事人各项主张。文书生成后，系统内置文档自动化校对功能，对文字错误、格式偏差和信息遗漏等问题进行智能检测。同时，系统还会针对成稿进行“挑毛病”式反向审核，以当事人立场对服判息诉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帮助法官进一步检视文书说理，并优化释法答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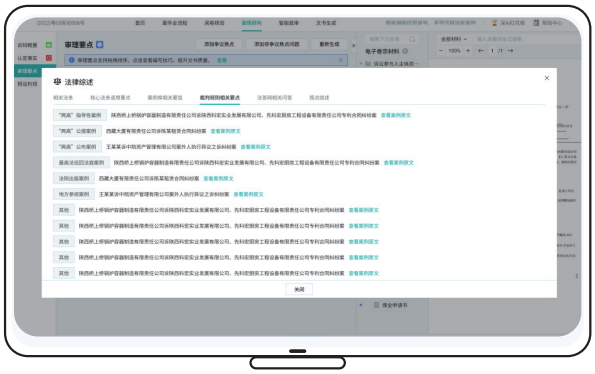
系统自动完成格式排版、信息录入和文字校对等事务性工作，将法官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将更多精力投入案件核心争议的研判。从形式上，文书严格按照规范

生成，减少了可能的人为误差和瑕疵，提升了文书质量。内容上，说理部分翔实严谨，能对当事人争议焦点一一回应。一位律师反馈：“当事人收到判决书，阅读说理部分后，表示自己有被重视的感觉，作为输掉的一方，不服的情绪都明显缓和。”目前，系统已辅助生成裁判文书稿 67.8 万份，形成规模化应用。

在文书草拟环节，系统严格遵循“不允许一键生成”的设计原则。系统草拟的只是文书初稿，法官对人工智能辅助草拟的文书负有审核、修改和决策的职责。文书中的每一项事实认定、每一段说理论证、每一项判项结论，都需要法官审核确认后才能定稿。系统不会替代法官作出最终的裁判。但对于法官作出的判断决策，系统内置反向审核功能，以当事人立场、法律效果等方面进行“自动质检”，帮助法官在定稿前发现文书的逻辑瑕疵、薄弱环节，进一步保障文书质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案件，既有诉讼案件共通的基本属性，也有因不同的诉讼法要求和案件特点具备不同的裁判规则和价值侧重。为便于理解，前述五个功能模块均从占深圳法院案件总数超过 92% 的民事诉讼角度来描述。而实际上，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审理，有着和民事案件办理截然不同的要求，系统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和具备特点的界面安排：刑事案件的办理，系统突出“以证据为中心”，加强对证据的合法性分析、证据链分析等。依照“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原则提供分析参考；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所以在系统里，审理要点不再局限于原告的主张，而是按照“全面体检”的原则进行整体推理。

6. 智能知识检索





法律知识检索是法官办案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国法律法规体系庞大且持续更新，最高人民法院还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参考案例和裁判规则，法官在办案时需要检索与当前案件相关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和类案裁判思路。传统模式下，法官需要主动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这种方式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检索结果依赖关键词的准确性，如果法官使用的关键词与法律条文的表述不一致，可能漏掉重要依据；二是检索是被动的，法官需要“知道要查什么”才能去查，但面对不熟悉领域的案件，法官可能不知道该查什么；三是不同法官的检索能力和习惯不同，获取的参考信息可能不一致，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

系统联通了覆盖法律法规、条文释义、裁判规则、权威案例和法律观点等多维度权威法律知识库，并形成面向司法场景的智能知识检索与推送能力。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引入 SAILER 模型等创新技术，突破传统依赖关键词匹配和文本相似度计算的检索局限，将法律推理能力融入检索过程，结合不同法律知识之间的内在结构与关联关系，对案件事实、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识别与案件具有实质法律关联的规则、案例和裁判观点，实现基于案情与知识直接关联的自主检索、关联匹配与智能推送，使法律知识服务从基于文本相关性的“信息查找”，进一步提升为面向案件法律问题的“知识追踪”与“标准辅助”。

该服务大幅提升了知识检索的便利性、充分性和统一性。通过在每个决策点自动推送权威知识和类案参考，系统帮助法官在复杂案件中迅速找准法律依据、比对裁判差异，促进裁判尺度统一。截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系统已累计提供 2274.6 万次知识服务，成为法官办案中调用最频繁的智能化服务能力之一。

深圳系统的权威知识服务体系还解决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一大重要关切：人工智能会不会“编造”法律条文或案例？大语言模型在生成文本时可能产生“幻觉”，即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上不存在的法律条文、案例名称或裁判观点。如果法官误信这些编造的内容并据此作出裁判，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

这一严格构建的权威知识库约束机制要求所有法律条文和参照案例均只能从权威知识库中智能抓取，严禁大模型自行生成。每条推送结果均链接至引用来源，确保依据链、来源链和解释链完整可溯。法官可以一键查看推送的法律条文出自哪部法律法规的第几条、参照案例的案号和裁判要旨原文。这一机制从源头杜绝了人工智能编造法律条文、案例的风险，确保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应用可验证、可信赖。简而言之，系统推送的每一条法律依据都是“真的”，且可以追溯出处。



（二）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智能体应用





2026 年，深圳法院审慎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果，融入了新一代自主智能体技术，在确保“白盒式”规范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场景之上，通过人机协同智能体和流程驱动智能体的创新应用，在案件的类型化、标准化、精细化辅助上持续“走深”，在流程驱动的重复性、事务性、操作性辅助上逐步“走实”。既全面发挥智能体技术在个性辅助、驱动效率和标准复用的优势，更构建出在司法领域通过“知识本体 + 技术引擎”双轮驱动，打造持续生长“活系统”的新范式。

1. 人机协同智能体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高度定制化的结构化交互界面，有效明确了辅助要点、确认了司法责任，显著减少了法官自主输入指令的负担。但在推动系统大规模应用的过程中，随着法官逐渐熟悉并习惯人机交互的办案方式，逐渐掌握人工智能的优劣特性，一个应用趋势日益清晰：法官不再满足于一个中规中矩、可以达到 80 分的通用助手，而是需要一个更加懂得具体业务语境、更加熟悉案由特性、交互更加灵活的专业搭档。针对主要案由进行精细化的智能体设计，正是实现人机深度协同的关键钥匙。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官长期面临三类核心痛点，而通用的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在应对这些痛点时同样存在明显局限：

一是事实梳理“不够了解案件类型的关键”。不同案由的法律要件和裁判规则有着天壤之别。如，民间借贷纠纷的核心在于“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的证明，劳动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劳动关系确立”“工作时长”与“工伤认定”。传统工具以统一模式抽取要素，无法兼顾决定案件走向的特有细节，进而导致案件事实梳理较为机械、粗糙，

人工智能无法基于各类案件特有的法律逻辑和要件准确整理事实要素，导致输出质量参差不齐，法官需要大量人工补足。

二是专业计算“算不清楚复杂的法律账”。诸多案由的裁量极度依赖精准的数学计算。例如，劳动争议中的各类报酬、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额、婚姻家庭纠纷中的夫妻共同财产清算、民间借贷中按复利与罚息分段计算的复杂利息等。大语言模型天然存在“数理计算幻觉”，若直接让其推算数值，极易出错，法官不得不另行手工核算。

三是人机交互“难以完成法官的个性化任务”。过去，法官使用智能辅助系统时，需要按照预先设计的系统步骤层层递进，系统预设的任务覆盖了审判的主线工作，但无法预见法官个性化、风格化的任务要求，人机协同停留在“机械叠加”层面。

系统化解决上述痛点、实现人机深度协同的关键钥匙，就是针对具体案由进行精细化的智能体设计。深圳法院为案由精细化智能体配置了核心技能与工具，作为其专业能力的驾驭层支撑，并以对话式的交互作为原有系统预设结构化交互的补充，实现结构化预定义任务和个性化法官指令任务的专业化升级：

一是案由专属要素提取技能。针对民间借贷、劳动争议、买卖合同、盗窃罪等主要案由，分别定制专属的“要素清单”与抽取规则。技能内置于该案由的法律要件构成体系，能够自动从诉讼材料中定位、提取并呈现关键事实要素，基于嵌入每类案由的专属的法律知识图谱，形成构成要件、裁判规则与争议焦点，指引草拟事实认定和文书说理，而非套用通用模板。智能体像经验丰富的办案法官一样精准穿透繁杂材料进行专业分析，法官看到的不再是通用文本，而是贴合具体案由裁判逻辑的专业分析，精准度和效率显著提升。

二是自主驱动式“法律计算器”。针对司法实践中高频出现的复杂计算场景，开发经过精准校验的专用算法工具，覆盖加班工资、人身损害赔偿、夫妻共同财产清算、复利与罚息分段计算等典型需求。智能体负责从材料中理解并提取计算变量，计算器负责精确运算，两者分工协同。智能体协同运用语义理解能力与法律计算器工具，可提取工作时长、工伤等级、借款节点与利率等关键变量后，自动调用校验算法完成精确运算。法官无需再另行手工核算，法律推理的严密与计算结果的零差错同时得到保障。

三是“第三屏”对话交互界面。系统采用三屏布局，在智能体按照法官指令完成个

性任务的“第三屏”，法官可以自主提问，调用各类技能、工具展开工作任务；可以要求系统针对特定的材料、文本进行深度分析；可以将智能体运行的结果反向融入“事实认定”“裁判说理”等环节；可以自定义常用指令，并将好用的指令发布至“指令广场”与全体法官共享。人机协同从预设任务与人工核验的“机械叠加”走向了预设任务和主动任务互相补充的“有机融合”。

在人机协同智能体的补充下，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在规范案件办理标准、落实司法责任制和满足法官个性化精细化需求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2. 流程驱动智能体

程序和实体，是司法审判工作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程序性工作的规范和高效办理，不仅仅是满足管理流程的需要，更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公正的底线保障，是司法权威性、严肃性的体现。程序性事务的办理质效，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诉讼体验和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立案受理、送达通知、排期开庭、庭前准备、文书校对、结案归档，每一项都关乎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公正。然而，长期以来，这些工作却是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最头疼的负担。

一是数量庞大。对照法律规定全面梳理，每个案件从立案到归档，可能出现需要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推动的程序性事务场景，多达 140 多个。深圳一名法官同时在办案件常常高达数百宗，意味着需要同时跟踪数万个程序节点，仅靠人力几乎不可能面面俱到、及时处理。

二是要求精细。程序性事务层层嵌套、繁琐复杂，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时限和规范要求。答辩期满才能排期，送达回证齐全才能开庭，笔录签字确认才能归档。任何一个环节的遗漏或延误，都可能影响案件正常推进，甚至引发程序瑕疵。

三是极易出错。在人案矛盾激烈的背景下，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疲于应对大量事务性工作，等待、延误、遗漏难以避免。一个案件的排期通知忘了发，可能导致庭审取消；一份送达回证没有及时归档，可能影响结案。这些看似细小的失误，累积起来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整体提质增效。

四是分散精力。法官本应将主要精力投入事实查明、法律适用、定分止争等高价值工作，但现实中大量时间被消耗在程序性事务的跟踪和操作上，真正用于裁判思考的时间被挤压。

针对上述问题，深圳法院在智能体司法应用的研发中，将流程驱动智能体的开发作为重点之一。它的核心理念是让智能体自主“跟着案、帮着办”，让程序性事务的办理从“人找事”变为“事找人”。

一是全流程自动感知。智能体对案件全流程节点实现自动感知，通过对案件多源数据的分析判断，实时追踪案件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民商事案件 5 个阶段、18 个环节的工作场景设计，覆盖 140 个业务场景，梳理了近 500 个案件办理状态的 700 多项识别触发条件。这意味着，案件到了什么阶段、该办什么事项、哪些材料还没到位，智能体都能自动识别并主动提醒，法官无需再靠记忆和经验去跟踪每一个节点。

二是待办事项卡片化。智能体以卡片形式将待办事项和进度展现在案件管理台账上，符合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办案习惯。法官打开系统，当前案件的办理进度、待办事项一目了然，可随时发出查询和操作指令。不再需要在多个系统之间来回切换，也不再需要翻阅卷宗确认下一步该做什么，因为智能体已经完成了整理。

三是程序性事务集约化办理。智能体不仅感知和提醒，更能直接执行。目前已实现智能体与底层业务系统的联通，可通过智能体指令触发程序性文书的生成、预览并入卷，指令查询案件排期情况和材料送达信息。案件整备、庭前准备、排期庭审、文书审阅、结案归档等各类程序性事务，均可实现集约化智能化办理。法官确认决策后，智能体按照规范工作流程自动推进后续操作，大幅减少手动操作的工作量。

流程驱动智能体为法官带来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减负，把记忆负担和操作负担交给系统。140 多个程序场景、近 500 个案件状态、700 多项触发条件，这些原本需要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人工记忆和跟踪的信息，现在由智能体自动感知和处理。法官不再需要记住“这个案子下一步该做什么”，系统会主动告诉你。

二是防错，用系统刚性保障程序规范。每一项程序性事务的办理都有规范的流程和

时限要求，智能体按照预设规则自动推进，有效避免人为遗漏和延误。该送达的不会忘，该排期的不会漏，该归档的不会拖。

三是提效，从“人找事”到“事找人”。传统模式下，法官需要主动去查、去问、去催。现在，智能体主动推送待办事项，法官只需确认决策，后续操作由系统自动完成。程序性事务的办理效率大幅提升，案件流转更加顺畅。

四是聚焦，让法官回归裁判本职。当程序性事务由智能体承担后，法官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事实查明、法律适用、定分止争、规则研究等更需要人类创造力的高价值工作。让“技术处理事务，法官专注裁判”，这正是研发流程驱动智能体的核心目标。

流程驱动智能体是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最新成果，首个版本于 2026 年 9 月份上线。目前正根据法官的使用反馈持续迭代优化，让流程驱动智能体真正成为法官办案的得力助手。

（三）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自成长性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还面对着迭代升级的可持续性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底层技术迭代速度极快，如果系统与某一技术方案深度绑定，一旦涌现出更新的技术范式，很容易面临底层重构的迭代需要。另一方面，司法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业务逻辑、适用标准持续演化，一些新的标准化司法实务知识也会持续产生。如果未能将各类知识变化及时注入智能应用中，很容易导致智能应用逐步脱离司法实务工作的需要。但是，鉴于司法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源投入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深圳法院不能、也不希求前沿技术和研发资源的无限投入，因此必须探索符合司法领域实际的可持续升级方式。

为此，系统突破传统信息化建设依赖资源、技术持续投入的迭代升级模式，顺应司法实践复杂变化的特征，率先开发知识可管理、模型可装配、模块可插拔的可持续进化“活系统”，实现“司法知识本体 + 前沿技术驱动”双轮协同迭代升级，让符合司法场景需要的各类智能“持续生长”。

一是知识本体可管理，实现持续更新注入。为了让智能体“持续弄懂审判业务”，系统创新构建蕴含司法业务标准的技能工具、任务链路配置管理平台。不同于传统以代码为基础的技术主导模式，这一管理平台完整采用可视化、低代码、文本式实现，法院

工作人员也可及时将最新司法业务逻辑、知识标准和经验沉淀转化为智能体可使用的技能工具和任务指引，通过各类链路配置、任务定义和驾驭工程“精准滴灌”至智能体的服务之中，将司法业务知识的“持续管理”转化为“一呼百应”“精准制导”的知识本体管理工具，同时可被法官和智能体使用，促进裁判标准和最优实践的规模化复用。目前，系统除了依托国家权威法律知识库实现法律知识的实时更新注入，还基于前期深圳法院知识管理形成的审理指南等知识本体，组织各专家法官将“隐性的业务标准实践显性化、知识化”，对通过专业机制审核的知识成果实施技术转化，目前已整合超 1000 项经认证的业务标准技能工具、程序规范流程和独有业务算法。这一系列知识工具作为最优实践知识持续注入系统，确保了系统的“常用常新”、不断成长。

二是技术引擎可装配，实现持续迭代更新。为了让司法场景持续共享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发展红利，在全面共享数据要素和知识本体资产的基础上，系统采用松耦合设计、模块化部署、可演进式微服务等灵活架构，实现了所有“通专结合”多模型引擎的按需更换，以及所有应用服务模块的灵活部署。第一，大模型可按需替换。深圳法院围绕司法应用的具体场景和驾驭工程设计，有针对性地组织近 200 名不同领域的法官制作了超 5000 道高质量司法场景人工智能应用专用题库，形成了独有的人工智能法律实务能力评价体系，同步拉通“跟进 - 测试 - 替换 - 上线 - 反馈”的闭环，可灵活地将各类安全可用的大模型智能体定向替换到具体任务和服务中，实现“驾驭工程持续优化、知识本体持续更新、智能引擎持续迭代”的分层迭代范式。第二，各模块可解耦优化。系统实现要素提取、智能阅卷、类案推送、庭审辅助、文书生成等各子功能模块的松耦合部署和独立优化，可以基于法官的应用反馈，以解决法官应用中具体问题为阶梯，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敏捷迭代，同时维持总体应用稳定。第三，新服务可便捷插拔。系统保持着开放的模块化、微服务演进架构，只要有更符合法官需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成熟前沿应用，均可通过插拔等方式快速接入深圳应用架构。目前系统集成了 6 家产、学、研主体的前沿技术，通过开放场景实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助力实现“最优业务效果、最优研发成本、最优应用体验”的持续研发生态。

三、深圳实践的创新亮点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所形成的示范意义不仅在于单项技术的突破，更在于将人工智能从实验室概念转化为覆盖审判全流程的生产力工具，形成了全球范围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完整方案。

（一）首个全流程系统性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

纵观全球，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探索并不少见，但绝大多数实践停留在单一环节或有限场景。在这一全球图景下，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全部诉讼类型、贯穿审判全流程的系统性人工智能应用。

1. 常见诉讼类型、案由全覆盖

系统自 2024 年 6 月上线 1.0 版本起，即覆盖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案由。此后持续扩展，2024 年 9 月上线行政案件模块，2024 年 12 月上线刑事案件模块。目前，系统已覆盖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 90% 以上的案件类型，法官在办理绝大多数案件时可获得人工智能的辅助。深圳法院的系统是全球首个将人工智能辅助从单一环节扩展至主要诉讼类型、案由的实践，这一覆盖广度在全球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尚无先例。

覆盖全部诉讼类型的意义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系统对不同案件类型法律逻辑的深度适配。民事案件关注合同效力与违约责任，刑事案件强调证据链完整与量刑规范，行政案件聚焦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三类诉讼的审理思路、证据规则和文书结构差异显著。深圳法院组织各领域法官参与工具构建和技能编写，将不同案件类型的审判逻辑转化为可执行的技能工具，确保人工智能辅助不是泛泛而谈的通用文本处理，而是贴合各案件类型专业要求的精准辅助。



2. 实体处理和程序推进全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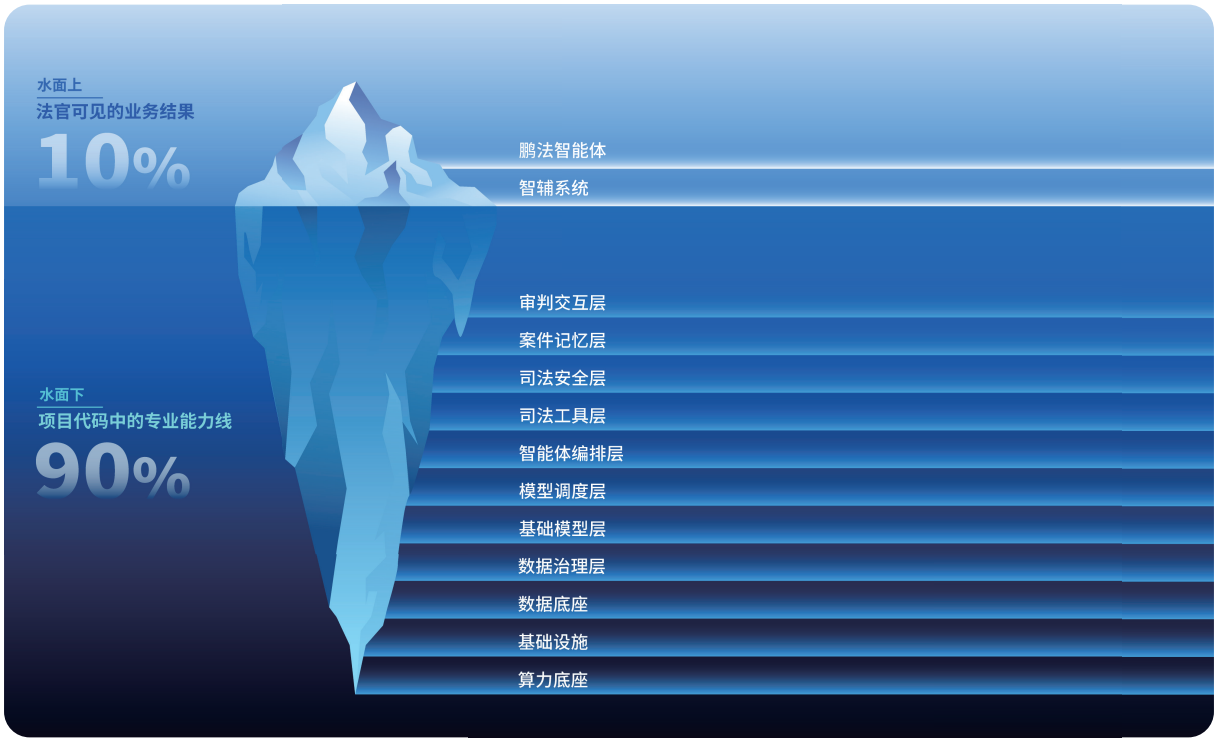
系统的另一项突破，是同时覆盖了审判中的程序性法律工作和实体性事务工作。程序性事务的规范高效办理，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公正的底线保障。实体性工作则涉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裁判说理，直接决定案件结果。在系统中，人工智能既协助司法辅助人员完成卷宗整理、信息核查、程序性事项办理、文书校验排版等程序性工作，也辅助法官完成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说理等核心判断工作。

系统采用通用性较强的设计，嵌入既有的法院业务系统，与电子卷宗、深圳数字法庭平台深度衔接。数字法庭负责前端诉讼材料的在线提交和标准化采集，电子卷宗负责材料的储存归档和程序性事务的办理，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则在此基础上进行智能分析和辅助决策。三者形成“前端采集—中端处理—后端智能”的一体化链路，避免了系统间割裂和数据孤岛。

系统贯穿立案审查、阅卷核验、庭审辅助、案情研判、文书草拟五大环节。同时，流程驱动智能体实现案件全流程节点自动感知，对案件多源数据分析判断，并根据法官决策和规范的工作流程，实现案件整备、庭前准备、排期庭审、文书审阅、结案归档等各类程序性事务的集约化智能化办理。

这种全流程覆盖使人工智能辅助不再是法官办案中偶尔使用的工具，而是嵌入每一个审判环节的基础设施。法官从立案到结案的每一步都有系统陪伴并承担更多的事务性工作，法官的精力得以集中于核心争议的判断和裁量。这正是全球人工智能司法应用长期追求但尚未实现的目标：不是用人工智能替代法官，而是用人工智能释放法官的专业能力，让技术处理事务、让法官专注裁判。

（二）首创司法领域专属智能体驾驭工程



大语言模型具备强大的推理和生成能力，但模型本身并不直接等于生产力。一个能流畅对话的模型，如果不清楚当前案件处于哪个阶段、不知道该调用哪些工具、不懂得哪些决策必须交回法官确认，就无法真正融入审判流程。行业将解决这一问题的工程方法称为“驾驭工程”（Harness Engineering），其核心理念是“人类掌舵，智能体执行”，即模型负责思考、推理并行动，驾驭框架负责控制模型完成交付闭环。围绕智能体构建约束机制、反馈回路、工作流控制和持续改进循环，让不可控、易出错的人工智能变成稳定、可靠、可工业化落地的生产工具。

对于司法领域而言，驾驭工程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司法审判对准确性、可解释性和责任归属有着远超一般行业的要求。一个“差不多正确”的答案在法庭上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做到足够精准。因此，深圳法院没有简单移植通用驾驭工程方案，而是从司法工作规律出发，由审判业务专家主导整体架构设计，全面梳理审判流程，明确人工智能赋能、规则重构和流程再造方向，打造了蕴含司法业务标准的司法领域专属驾驭工程。驾驭工程肩负三项核心任务：

1. 如何形成司法生产力：让模型从“能说话”变成“能干活”

大语言模型能推理、能写作、能总结，但仅凭模型本身，它并不知道如何安全地使用工具、如何记住案件状态、如何遵循审判权限规则、如何从错误中恢复。模型负责思考，驾驭框架负责控制模型如何行动。这一分工在司法场景中意味着：模型提供法律语义理解和推理能力，驾驭框架负责将这份能力组织成符合审判流程的、可交付的工作产出。

深圳法院的司法领域专属驾驭工程，通过集成“通专结合”多模型引擎和权威知识库服务，实现了根据业务场景需要进行动态的任务上下文整合，再交由多模型引擎辅助。系统可自主完成案件记忆整理、法律知识准入、认证技能调用、法官决策注入四个关键环节。这意味着系统不是简单地“问模型一个问题，等一个答案”，而是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助理：它知道当前案件处于哪个阶段、需要调用哪些技能工具、应该参考哪些权威法律知识、哪些环节必须交回法官确认。

具体而言，深圳法院将审判流程拆解为立案、阅卷、庭审、研判、文书制作五大环节，每个环节都配置了对应的技能工具和知识服务。智能体在执行任务时，驾驭框架负责编排工具调用顺序、管理案件记忆（按案件隔离、按任务清零，防止跨案件信息污染）、控制执行边界，确保每一步产出都符合审判逻辑和业务标准。这种从“模型能力”到“司法生产力”的转化，正是驾驭工程的核心价值所在：不是让模型更聪明，而是让模型在司法环境中更可靠地工作。

2. 如何防止“幻觉”：多层防线，从源头到输出的全链路可信管控

幻觉是大语言模型的固有风险，模型可能生成看似合理、实则不可靠的内容。在司法场景中，这意味着模型可能编造不存在的法律条文、虚构案例事实或给出错误的法律适用意见。如果这些内容进入裁判文书，后果不堪设想。深圳法院打造的司法领域专属驾驭工程，构建了从输入到输出的多层防线来系统性地防范幻觉风险：

第一层：知识准入，只允许权威知识进入推理过程。系统严格禁止人工智能自主生成法律条文和案例文本。所有法律推理所依据的知识必须直接来源于经过认证的权威知识库，对诉讼材料中可能存在的虚假法律信息进行识别与警示，严防“知识污染”。这意味着模型不是从自身训练数据中“回忆”法律条文，而是从经过治理的权威知识库中检索和引用，进而从源头切断幻觉产生的最主要途径。

第二层：安全护栏的多层组合部署，过滤输入输出。系统设置了多层安全护栏，通过规则库、判别模型等技术手段，对输入输出内容进行识别、拦截和处置。对使用者的直接输入实施安全过滤与越狱攻击检测，拒绝明显的诱导性指令；对智能体调用外部技能工具所获取的第三方信息实施指令过滤与格式隔离。

第三层："法官决策在环路"，人工确认贯穿全流程。系统在关键节点设置反复校验、递进审核、知识准入、人工决策的交互体系。多智能体进行全流程辅助和重要节点"强制质检"，但每一项实质性结论都必须由法官明确作出，例如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结论等。系统严格禁止以"裁判建议""一键生成结论"等形式提供替代性决策方案，坚决杜绝形成跳过人工判断的自动化链路。

第四层：全程可视化溯源，"白盒式"可信辅助。系统全程确保案件信息来源、知识原文、法官决策和生成结果的可视化溯源。每一项分析结论都能追溯到其依据的证据材料、法律条文和知识库原文，法官可以逐项审查、确认或拒绝。这种全链路透明化设计，使系统从"黑箱式"输出转变为"白盒式"可信辅助。法官不仅看到结论，更看到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通过这四层防线的叠加，系统有效防范了大模型应用的幻觉风险，让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中实现了可用、有用、好用。

3. 如何实现算力经济性：以工程优化替代算力堆叠

大模型的推理和后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算力，而法院作为公共机构，算力资源有限。如果完全依赖更大参数量的"规模定律"来提升效果，不仅算力成本难以承受，也未必能实现司法场景要求的专业性、精准性和稳定性。深圳法院的驾驭工程则验证了一条实现经济性的路径：不追求模型本身的极致性能，而是通过优化模型运行环境来提升使用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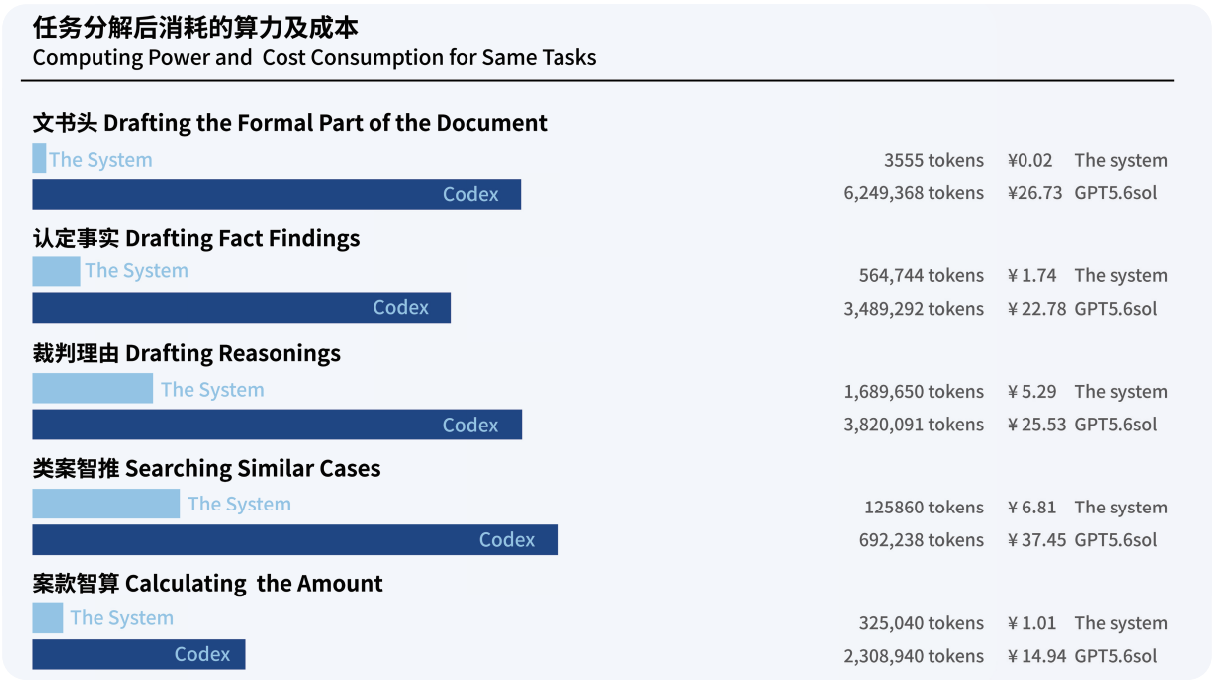
一是精准的法官思维链和上下文工程，减少无效推理。系统通过司法辅助任务的动态上下文整合，只在需要时注入与当前任务相关的案件信息和法律知识，避免将大量无关信息送入模型推理过程。这不仅提升了输出的准确性，也显著降低了单次任务的算力消耗。

二是技能工具的模块化部署实现按需调用。各功能模块（要素提取、智能阅卷、类案推送、庭审提纲、文书生成等）独立部署，只在对应业务环节被调用，而非全程运行一个庞大的统一模型。这种“用哪个调哪个”的设计，使有限的算力资源得到最高效的利用。

三是“通专结合”多模型引擎实现算力分级。系统集成了通用模型和专业法律模型，根据任务复杂度自动选择合适的模型层级。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交给轻量级模型处理，复杂的法律推理才调用重量级模型。这种分级调度策略，在保证输出质量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整体算力消耗。

四是权威知识库替代模型记忆。系统不依赖模型自身“记住”所有法律条文和案例，而是通过知识检索实时获取。这意味着模型参数量不需要无限膨胀来容纳越来越多的法律知识，算力投入可以聚焦在推理能力而非记忆容量上。

这种以工程优化替代算力堆叠的思路，使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在有限的国产化算力条件下，实现了对三大诉讼 90% 以上案件的智能辅助覆盖。它证明了一个重要结论：在垂直领域，驾驭工程的精细化程度比模型参数量更能决定实际效果。这也是算力有限投入下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可复制经验。



（三）首次在生产环境落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安全体系

在推进数字法院与司法科技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固然为司法审判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效能动力，但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与安全隐患也接踵而至。如果缺乏严密、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人工智能技术非但无法成为司法公正的“倍增器”，反而可能演变为引发司法信任危机的“隐形炸弹”。深圳法院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设计之初就坚守安全防线，并在落地过程中持续强化，着力打造安全可信、稳定可靠的运行体系。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措施：

1. 数据闭环的专网部署

司法大模型的应用虽极大提升了办案质效，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场关于数据泄露与隐私安全的严峻考验。法院卷宗与司法文书天然包含了大量个人身份信息、商业秘密乃至社会敏感数据，一旦在公有云或互联网环境下传输与训练，极易面临数据越权抓取、恶意截获乃至被外部模型隐蔽吸收的风险。这种安全隐患不仅威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直接关乎司法公信力的根基。为此，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全面统筹严格管理下，深圳法院依托政法专网部署专属大模型，所有模型服务与互联网物理隔离，有效破除安全焦虑、全面保护当事人隐私信息。

一是在顶层统筹与制度规范层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安全挑战，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分别从司法领域和地方管理视角出台严密的管理规范与技术标准，深圳法院据此实现统一审查、统一部署，确保各类大模型的研发、训练与应用全过程均在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内运行，从机制上杜绝了技术失控与违规滥用的可能。

二是在专网部署与物理隔离层面，专属大模型部署在政法专网这一内部安全网络，切断了来自互联网的网络入侵、远程数据窃取及数据毒化等威胁路径，解决了互联网环境下可能遭受网络攻击与非法调取的安全隐患，从网络层面为司法数据筑起了坚固的物理安全屏障。

三是在隐私保护与信任重塑层面，这种闭环设计有力回应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数据泄露的深度关切。当事人的身份证件、财产状况、商业履约细节等隐私信息进入司法流程时，系统在物理隔离的专网环境下完成抽取、比对、推理、归档等操作，所有数据处理和应用均在专网进行，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当事人隐私数据应用的存储采取了分类分级的处理，相关数据按照档案规范要求来保存，确保敏感司法数据绝不出专网边界，全程闭环处置。

2. 安全为本的专门设计

在严肃的司法场景中，任何层级的漏洞，无论是顶层业务逻辑的混乱、中层推理算法的“黑箱”，还是底层模型与智能体的安全缺陷，都可能引发裁判失误乃至司法公信力的崩塌。单点修补式的安全防护无法应对复杂的司法实践，必须将安全可信的基因融入系统研发的每一个环节。为此，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顶层应用架构和知识体系、中层可信算法和上下文链路、底层模型调度平台、基础模型、智能体均遵循安全可靠设计，从系统顶层到底层的全栈安全贯穿，实现了安全防护从“被动打补丁”向“内生安全”的根本跨越。系统成功通过了国家级权威机构的严苛测试，获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中国信通院颁发的最高等级智能体安全能力认证，树立了司法审判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信的技术标杆。

一是在中层算法与上下文链路维度，系统采用可解释人工智能与严格的上下文防篡改链路，全链条严防提示注入，确保从证据提取、逻辑推演到文书生成的每一个环节均具备全程可追溯的溯源机制，精准化解了大模型逻辑漂移与上下文污染的技术隐患，让算法的每一次运行都在信息来源上接受审查，最大程度降低模型幻觉，提升推演逻辑的可解释性与可追溯性。

二是在底层调度平台、基础模型及智能体维度，系统破除了基础设施脆弱与智能体自主越权的安全瓶颈。底层是整个系统的基石，基础模型的漏洞、调度平台的资源越权以及智能体在多步规划中的失控风险，直接威胁着系统的整体稳定。系统搭建了自主可控的模型调度平台，选用经过深度安全加固的基础模型，并在智能体交互设计中引入零信任架构与动态权限隔离机制，确保智能体在自主执行检索、推演和归纳任务时，始终在严格限定的安全边界和安全沙箱内运行。

3. 专门机制与专人管理

随着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从研发测试、试点运行到走向大规模、常态化应用，系统的生命线已然从“功能是否实现”转向“运行是否安全稳定”。为打造符合人工智能司法应用需要的技术管理模式，深圳法院建立专门运维架构和安全专员机制，严格做好研发、部署、上线、运维全环节的技术管理。

一是在研发源头层面，全环节引入“开发安全一体化（DevSecOps）”理念，将代码安全审计、敏感数据脱敏规范和静态漏洞扫描嵌入研发的每一个节点，确保代码在编写之初就注入安全基因，从源头上切断非法入侵与系统隐患滋生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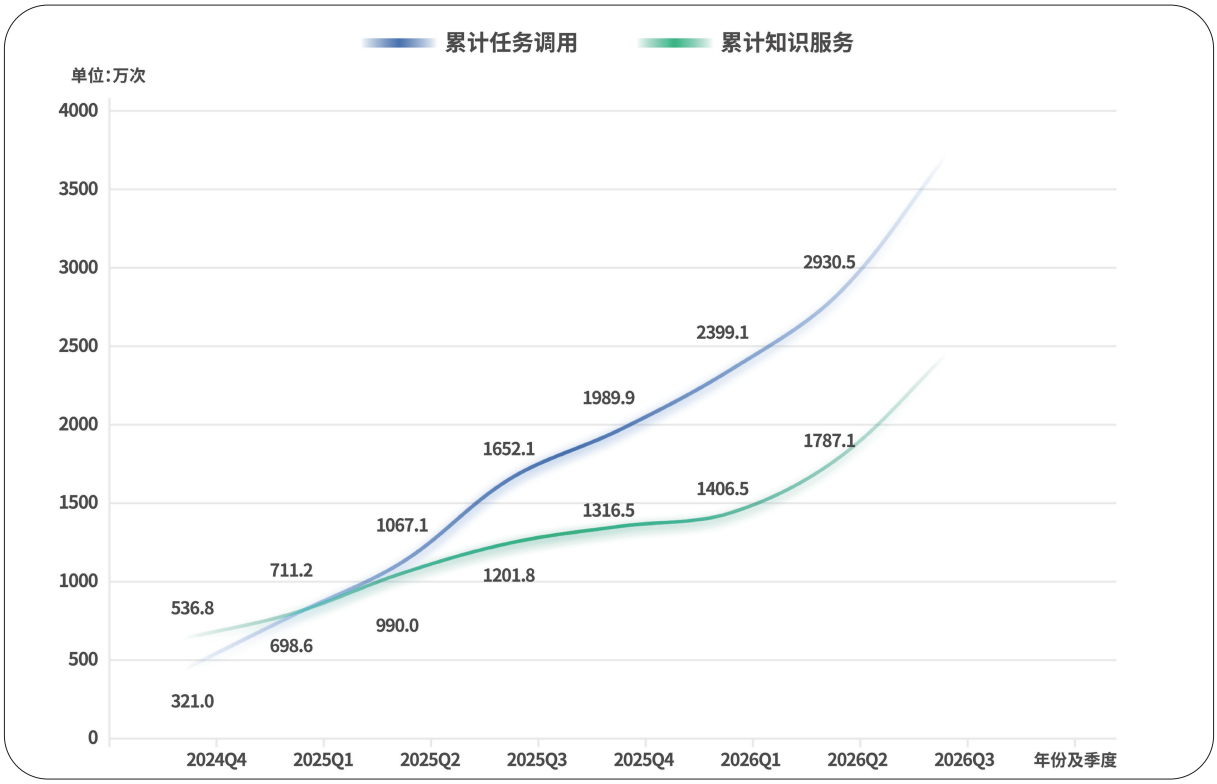
二是在部署上线层面，建立严格的上线审批和用户验收测试机制，任何新功能或版本迭代都必须在隔离的用户验收测试环境中经过压力测试、安全评估和专项业务测试。只有通过业务与技术的复核与授权，并经审批方可进入生产环境，确保每一次更新都平稳、可控、可回滚。

三是在专门运维架构层面，一方面通过独立化与可隔离的架构设计破除传统运维权限泛滥的隐患，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最小权限原则与专用通道隔离，配合全天候自动化日志审计与异常流量监测，实时掌握系统运行状态，更能在出现微小异常时秒级响应、精准定位，实现对系统运行状态的穿透式掌控。

四是在安全专员机制层面，设立专职安全专员，赋予其独立的安全审查权与一票否决权，由其全程跟踪从研发到运维的每一个环节，定期开展安全评估与应急演练。安全专员就像是系统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哨兵”，不仅填补了人机协同中的管理漏洞，更从制度上确保了各项安全管理要求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地见效。



四、深圳实践的应用成效





实践证明，人工智能辅助应用已经在深圳两级法院形成稳定、有效的司法新质生产力。系统自上线以来，截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累计调用大模型、智能体完成任务 3545.1 万次，辅助阅卷 60.9 万件、辅助庭审 26.9 万次、辅助撰写文书 67.8 万份，深度赋能超过 70 万宗案件，有效缓解法院人案矛盾压力。同时坚持质量优先，累计推送相关法律知识服务 2274.6 万次，系统深度应用赋能显著，审判质量与效率同步跃升。

这些应用数据的背后，是技术工具与配套制度的协同发力，深圳两级法院主动围绕系统运行逻辑，同步推进审判管理模式优化、专业化审判机制完善，并想方设法调动队伍办案积极性。这些改革举措与系统应用同频共振、互为支撑，带来了审判质量与效率

的同步提升。在审判质量方面，上诉率、改判发回重审率分别下降 48%、65%；在审判效率方面，2025 年深圳法院办结各类案件 773828 件，法官人均结案 744 件，同比增加 249 件，人均月结案数较上线前提升 60%。

法官的切身感受为上述变化提供了生动的注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坪地人民法庭的一位法官在应用体会中写道:“系统帮助法官回归裁与判……法官不再被‘能否做完’的焦虑困扰，而是能够专注于‘如何做好’。”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一位法官也谈到：“系统对我而言，就像开车时所用的导航，已经成为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不管审判的道路如何崎岖坎坷，有了科技的赋能，我们就可以在通往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稳。”这些来自一线的声音表明，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的价值，不仅在于分担事务性工作，更在于为法官腾出精力专注裁判核心，在效率与质量之间实现良性平衡。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 + 司法审判”体系实践获得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已经形成国内司法智能化转型的推广样本。深圳法院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优势以及显著的实践成效，受到国内广泛肯定，各级法院在内的超 200 家国内单位专题来深圳法院考察学习。考察单位普遍认为，深圳法院的应用体系贯穿系统工程理念，贴合工作实务，在司法和政务服务领域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和可复制性。2025 年 4 月，“数字深圳联合创新中心”正式设立并同步在深圳法院设立分中心。2025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设立全国唯一的“全国法院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联合创新（深圳）基地”，在深圳构建了高保真、全场景软硬件实验环境，推进“一地创新、全国共享”。依托两大创新平台，深圳法院正在通过专属软硬件实验环境，承担智能化创新服务的研发应用和反馈迭代工作。

目前，在创新基地机制下，新开发了司法建议书草拟、类案检索报告、法律知识深度研究、简单案件快速草拟等功能，并已经全面融入全国法院“一张网”统一办案办公平台，目前在全国多家法院开展试运行工作，下一步将全面铺开、推广全国。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深圳法院也在加快总结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标准体系，全力构建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理论体系，总结固定技术应用指南、司法伦理指引等社会普遍认可的应用规范原则，将深圳法院的探索实践转化为先行先试、具有实践价值的应用标准。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上线运行和深度应用，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哈佛大学《法律分析杂志》刊发《法官如何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自深圳的实证》（“How do judges use large language models? Evidence from Shenzhen”），提出“深圳法院是全球首个在司法领域系统全面、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的法院”。港澳地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多次专题调研学习，巴西、越南、新加坡、葡萄牙等 20 国司法政要代表团先后 20 余次来访学习。新加坡最高法院参访团更将深圳实践誉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深圳法院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创新实践不仅在粤港澳大湾区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更凭借其创新性和先进性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认可，已逐渐成为一张展现中国法治建设成就的样本名片。

五、深圳实践的经验分享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建设与运行，是一项划时代的系统工程。然而，前路并无现成航标可循。在司法领域系统性应用人工智能，全球范围内尚无成熟先例，深圳法院踏入的是一片真正的“无人区”。没有可借鉴的工程范式，没有可复用的技术路线，甚至没有可参照的评估标准。每一步前行都伴随着对未知的试探，每一次决策都体现着对司法安全的审慎。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深圳法院的实践认知经历了螺旋式的上升：从单一模型的“万能论”，到转向工程化组装的“系统论”；从将模型参数视作知识来源的“生成依赖”，到确立权威知识库为唯一来源的“白盒推理”；从专家统一编排的“规范模式”，到交予法官自主定义的“开放生态”。三次主要试错总结，三次转向跃迁，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在更深层次上重新理解了人工智能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一是首次转变，从“垂类模型至上”到“工程化交付”的试错跃迁。2023 年研发初期，深圳法院系统测试市面可用大模型基座，发现无一能满足生产环节落地需求，遂转向自建法律垂类大模型，全力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裁判文书、法答网问答等悉数纳入训练语料，通过大规模预训练和指令微调让模型“吃透”法律知识。垂类模型在法条检索、类案匹配、法律术语理解等方面确实远超通用模型，但深层问题随之浮现：它本质上仍是一个问答工具，无法端到端满足各类审判辅助任务的实际需要。实践证明，无论垂类模型训练多么精良，都不可能仅靠自身完成从案件事实到裁判文书的全部任务。这一认识推动深圳法院做出根本性路线调整：不再指望一个模型“包打天下”，转而采用“工作流编排 + 专家技能工具 + 工程化组装”的工程化方案。模型不再是答案的直接生产者，而是被编排进更大的工程体系：由法律专家定义任务、萃取工具、编排可解释链路；由工程手段串联技术组件、完成模型调度与安全约束；由法官在关键节点审核确认，确保“法官决策在环路”。这是从“模型中心主义”走向“工程中心主义”的第一次认知跃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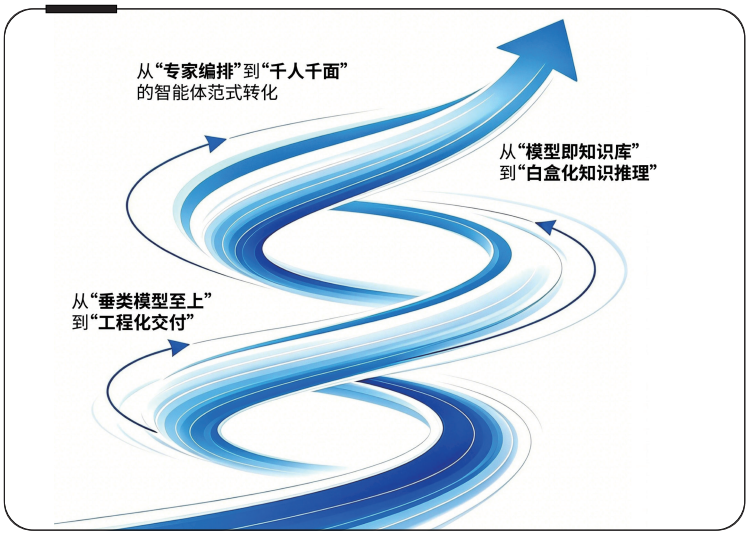
二是再次提升，从“模型即知识库”到“白盒化知识推理”的安全重构。垂类模型在法律知识场域展现出高于通用模型的法律能力后，研发团队一度假设：既然模型已内化海量法律知识，何不直接让其成为所有知识性任务的引擎，并在模型内部嵌入安全性机制与可解释性模块。研发团队尝试了思维链约束、法律规则图谱校验、对抗训练识别幻觉等多种路径，均在小范围实验中取得阶段性效果。但只要推向生产环境，一个事实

反复被印证：只要大模型将自身参数作为知识来源，幻觉就无法避免。这对司法“高利害”场景极其危险，模型可能生成不存在的法条、过时的司法解释、伪造的案例信息，且生成虚假内容时往往表现得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与内容真实性毫无关联。一旦虚假信息进入裁判文书，将直接动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根基。因此研发团队彻底转变思路：垂类模型参数不得作为法律知识的直接来源，红线一经划定，整个系统安全底座也随之重构。系统将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更新的知识库体系作为唯一权威知识来源，所有算法模块和模型智能体的角色被严格限定为“架桥”，即在知识库与案件、知识库与法官任务之间搭建桥梁。在这一体系下，垂类模型负责理解、检索、比对、整理和搬运，无权“补全”任何法律知识；系统同步确立“知识准入”白盒机制，所有进入裁判文书或推理环节的法律知识，必须经法官确认审核及知识库校验，据此实现推理链条的白盒化和可解释。系统的每一步推理都有明确知识来源可追溯，法官看到的不是黑箱中的“概率猜测”，而是可验证且直连权威知识库原文的推理路径。这套“权威知识库 + 知识准入 + 白盒推理”三位一体架构，至今仍是系统运行的防幻觉基础。

三是逻辑重构，从“专家编排”到“千人千面”的智能体范式转化。理清工程化机理后，深圳法院组建资深法官与优秀工程师团队，从“最优实践”视角对智能体各项流程进行标准化编排，试图为法官群体提供一套“最佳实践”操作框架。系统上线初期反馈良好，但随着实践深入，“规范化 VS 个性化”的难题开始涌现：专家的统一逻辑难以满足所有办案场景，法官个性化需求从各方向涌现：有的偏好特定类案检索逻辑，有的习惯独特的证据梳理方式，有的在裁判说理环节有自己的行文风格和论证偏好。从少数专家视角编排的统一流程，无论如何精致，都无法覆盖所有个性化需求。更深层的反思在于：过度强调“专家编排”可能恰恰与司法智能化核心目标相悖。

法官的创意性发挥、裁量式证成和个性化探索，不仅是审判工作的应有之义，更是推动法律知识持续增长和实现案件实质性公正的重要动力。若辅助系统反而抑制了法官能动性，便背离了“辅助”本意。这一认识催生了最重要的底层路线重构：将驾驭工程的能力从专家手中开放出来，直接交给法官个人。系统大规模复用经业务认证的“技能工具”，将原子化的最优实践配备到每位法官的规划链路和个性任务上；建立“指令广场”平台，供法官分享、交流和复用个性化办案方法。法官可将自身经验编写为指令，嫁接到大模型能力之上形成专属智能辅助工具，其他法官可浏览、借鉴、改造这些指令以适

配自身办案风格。由此实现了从“千人一链”到“千人千面”的转变：在同一套安全可控的工程框架内，每位法官都可按自己的办案理念和工作习惯自由配置和调用智能辅助能力。个性化不再是边缘需求，而成为系统设计的核心假设。在规范的白盒式辅助与开放的个性化服务之间，新的设计逻辑取得了技术开放与司法底线之间的严格平衡。尽管“一键生成”仍被严格禁止，专家编排的规范链路仍需在步骤上被遵循，但法官各项智能任务的实现方法将允许其本人定义。



深圳实践经历的三次认知跃迁，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实践轨迹，这不仅产生了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这一具体的成果，更是在组织建设研发和推广应用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深圳特点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新路径。这些经验对于各个行业应用人工智能，均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一）上级法院、地方支持的资源集聚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不是一家法院、一家技术企业能独立完成的工程。深圳法院面对的问题是：司法领域缺乏专业大模型，法院自身没有算力基础设施，法律知识资源分散在不同机构手中，而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信息化项目的更新周期。深圳法院的解法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专业指导下，紧紧依靠深圳市委领导、取得市政府支持，实行开放合作与资源共享，搭建一个开放架构，把最好的技术、最权威的知识、最强的算力都接进来。

1. 地方支持：倾注地利的统筹研发

深圳是一座创新型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为实践探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体制赋能、技术支撑与创新生态。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辅

助审判项目，从研发初期就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视为深圳建设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突破重点，市委主要领导专门作了批示支持，深圳市委政法委、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对系统研发所需资金、技术、数据、算力等资源给予全力保障，陆续投入上亿财政经费、230P 智算算力用于应用研发，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为系统建设提供了可持续保障。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全程跟踪、大力扶持该探索实践，项目可行性研究期间，最快速度组织专家评审、出具评审意见，充分体现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实践探索过程中，密切关注研发进程，统筹安排算力资源，帮助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共同推进系统的持续优化升级；在实践探索的里程碑关键节点，联动开展技术指导与方向把控，通过数字深圳实验室机制、信息化建设项目等方式投入资源和一揽子政策支持，实现持续的迭代升级和安全保障。

2. 数据支撑：助力精准的万亿语料

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中最怕“知识幻觉”。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让系统基于权威、可信的法律知识库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深圳法院与人民法院出版社合作，集成人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法信等权威知识服务体系，为系统提供了近万亿汉字量级的法律专业语料及权威知识引擎，最大程度提升法律检索及适用的精准度。

3. 技术体系：软硬件全栈“中国智造”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需要强大算力和技术支撑，而司法数据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性要求系统不能依赖外部算力服务和技术服务体系。系统由具备国家甲级保密资质的深圳迪博技术有限公司编写代码和集成，其顶层业务应用架构和知识体系、中层可信算法和上下文链路、底层模型调度平台、基础模型、智能体均实现全栈自主研发。同时，深圳法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率先完成整个系统的昇腾国产化算力适配，成为华为算力司法应用的全球样板点。目前，该系统在人机交互层、智能应用层、模型调度层和专业工具层已取得 4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 1 项外观设计专利，既实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技术的自主性与安全性，也确保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把握方向、严守底线的制度先行

在研发之初，面对大语言模型司法应用的“无人区”，深圳法院首先开展的是应用

规则研究，将技术原理、司法伦理、应用安全统一起来确定基础性规则，既指导应用研发的具体工作，也划定必须坚守的安全红线，确保方向不偏、严守底线。

实践证明，深圳法院坚持“制度先行”，确保了方向正确、不走弯路。在 2023 年，深圳法院提出了“锚定辅助工具定位，深度融入审判环节，同步落实司法责任，全程确保数据安全”四项研发原则，指导了将大语言模型全面融入司法审判工作全流程的首创实践。2026 年，深圳法院基于自主智能体的技术原理和应用风险，联合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清华大学互联网司法研究院、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提出了“禁止转授决策性职权、禁止注入未治理数据、禁止应用未认证技能、禁止逾越安全性护栏”四项负面清单，并发布全球首个《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目前已迭代形成 2.0 版，从司法场景使用者视角提出“定义任务 - 监督过程 - 核验输出 - 驾驭环路”四大智能体应用环节的具体指引。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深圳法院在实践中沉淀的应用规则体系，既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这一严肃领域的稳妥应用，也为“高利害”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沉淀贡献规则标准。这个规则体系不但获得最高人民法院高度认可，同时对世界各国均具有参考借鉴意义。在亚欧美非四大洲 20 个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司法部门来深学习考察过程中，各方普遍对深圳实践中沉淀的应用规则表示高度认同，认为这是具有实践价值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规则体系。

（三）业务牵引、双跨融合的研发模式

人工智能进入司法领域，不是把现成技术搬进法院那么简单。深圳法院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团队不懂审判逻辑，业务团队不懂技术边界，传统信息化项目“技术主导、业务配合”的模式屡屡导致系统“能用但不好用”。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研发，从方法论层面系统回应了这一挑战，形成了以问题导向、业务牵引、一体扁平、敏捷迭代为核心特征的研发模式。

1. 问题导向：从法官真实痛点出发

深圳法院研发的第一步，不是写代码，而是让法官坐下来梳理“每天到底在忙什么、哪些事最耗时”。业务团队全面拆解立案、阅卷、庭审、研判、文书制作五大审判环节

共 85 项流程，逐项标注痛点与堵点，即哪些信息需要反复核对？哪些文书段落需要手动重复录入？哪些证据梳理工作耗费大量时间却价值有限？在此基础上，梳理成智能体可介入的辅助任务类型。

法官和法官助理组成的核心设计团队自主绘制了系统整体业务架构设计和模型赋能任务链路图，撰写了 10 余万字的业务规则文档，将法官头脑中隐性的经验转化为显性化、可执行的知识和规则。这使得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由法官设计，被法官试用，为法官赋能”的系统，确保了系统在应用层面的可解释、可测试、可验证、可信赖，真正实现了从“技术可用”到“业务好用”的跨越。同时，能够在研发过程中，切实地解决自身工作中的难点痛点，也使得参与研发的法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励，形成了积极乐观，勇于挑战的创新氛围。

2. 业务牵引：让审判逻辑驱动技术实现

深圳法院坚持“业务挂帅”原则。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审判业务，而非业务迁就技术。核心需求设计、流程再造方向、功能优先级排序，均由审判人才主导决定。技术团队的角色，是将业务需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工程方案，而非反过来定义业务流程该怎么做。

具体做法上，业务人员负责分析法律规定和业务规则，整理流程规范和工作技巧；技术团队则搭配业务算法、知识库校验等方法，形成符合审判逻辑的应用路径。双方不是简单的需求交接关系，而是共同对每一项功能是否符合审判实际负责。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深圳两级法院先后动员了 40 名法官参与研发、300 余名法官参与测试、3000 多名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参与使用和反馈。这种安排确保了系统始终沿着司法自身逻辑演进，而非被技术能力牵着走。

3. 一体扁平：打破壁垒，融合研发

传统信息化项目往往部门分割、层级冗长，业务提需求、技术做实现、领导做审批，链条越长效率越低。深圳法院彻底打破了这一模式，采取“专兼结合”的一体化团队建制，打破部门壁垒和层级限制，扁平化推进研发工作，各小组分工负责，减少冲突、重复与等待。

核心团队由法院业务人才和技术人才一体化组成，融合办公、协同推进。深圳法院大胆起用年轻人才，一期研发核心团队的青年审判业务人才平均年龄仅 32.6 岁，授权他

们担任业务、技术、设计总监，统筹各项目小组的设计、测试与反馈。每周召开例会，确定攻坚目标，解决疑难事项，及时总结纠偏。让真正需要使用工具的人参与决策，缩短决策链条，提升执行效率。深圳法院要求专职参与研发的法官和法官助理实现“双跨一步”的认知跃升，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系统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逻辑，理解大模型的第一性原理，掌握现有技术在司法应用中的局限性与可能性。同时，也对技术团队开展法律理念和司法流程的培训，使其理解一线工作现状。通过这种深度跨界融合，业务专员与技术团队形成了真正的“融合研发”共同体。

4. 敏捷迭代：小步快跑，实战进化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瀑布式开发面临需求冻结过早、交付周期过长、用户参与不足、风险后置等结构性困境，难以适应司法政策快速迭代、业务需求动态变化的现实要求。深圳法院摒弃了“一次性规划、长周期交付”的旧路，采取“边研发、边试用、边完善”的科学路径。

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通过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方式，将研发成果第一时间投入实际应用。系统从正式研发到上线仅用 7 个月，实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从 0 到 1 的突破。上线后，深圳法院建立常态化问题反馈通道，每日收集并响应法官提出的具体痛点，每周根据一线使用数据与反馈意见进行版本更新。上线首月即排查解决问题 877 个，问题日反馈量从 183 个迅速降至 69 个。上线两年多，系统历经 3 次重大架构版本演进，累计完成 500 余次敏捷微迭代与优化。从 2024 年 6 月的 1.0 版迭代至 2024 年 12 月的 2.0 版，进而到 2026 年 8 月的 5.0 版，从最初覆盖民商事主要案由，逐步扩展至行政、刑事案件模块，并深入证据分析、事实认定等核心环节，目前已覆盖三大诉讼 90% 以上的案件类型。

整个迭代过程坚持以实效为唯一准绳，即法官觉得有用、好用、易用，案件质效提升才是硬道理。评价体系不片面聚焦技术指标，而是以法官的实际体验与办案质效提升度为核心考量标准。通过持续交付可用成果，系统逐步获得了法官对系统的信任，进而建立起对人与机器协同办案的信任，已经形成了可持续更新成长的“活系统”。

（四）理念转变、深度应用的生态培育

技术系统上线只是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法官愿不愿意用、会不会用、用了之后能不能持续优化。如果系统只是部署了却无人使用，或者使用了却缺乏反馈机制，再好的技术也会沦为摆设。深圳法院的目标，是培育一片让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常态化、长期化生长的生态土壤。深圳法院从转变观念、培训技能、革新管理、积累人才四个方面系统推进。

1. 转变法官观念：从“要我用”到“我要用”

人工智能进入审判流程，法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疑虑：它生成的结论可靠吗？用了出错谁负责？这些顾虑不消除，系统再强大也推不动。

深圳法院的做法是让“用过的人说真话”。参与研发的法官带头使用、带头分享，到各审判业务庭和各基层法院当面交流，讲自己的真实体验：系统在哪些环节帮了忙，哪些地方还不够好，怎么用才最有效率。同时，在法院内网开设“鹏法 AI”专栏，选登法官应用经验心得和智裁案例精选 103 篇；在系统中发布使用“红花榜”，让积极使用的法官被看见、被认可。这些举措的核心目的，不是自上而下地要求法官使用，而是让同行用真实案例说服同行“技术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替代的。”当法官发现系统能切实减轻事务性工作负担，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裁”与“判”的核心工作中时，观念转变就水到渠成了。

2. 培训法官技能：确保人人会用、善用

观念通了，还要解决“怎么用”的问题。深圳法院开展大规模、分层次的实操培训，覆盖全体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确保人人会用、善用。组建“启明讲师团”，选拔研发专员和优秀用户担任讲师，到各审判业务庭、各基层法院开展当面交流。讲师不是技术人员，而是真正在办案中使用系统的法官，他们讲的是实操经验而非理论概念。2025 年，深圳法院联合深圳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鹏法天平杯”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技能竞赛，纳入深圳市第十五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 2025 年深圳技能大赛，全市法院审判业务庭 4100 多名司法人员全员参赛，创下深圳市技能竞赛参与人数最多的纪录。通过比赛挖掘了一批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的审判骨干，将获奖选手的优

秀经验和先进工作方法广泛传播，带动整体应用水平提升。以赛促学、以学促用，让技能提升从被动培训变为主动切磋。

3. 革新管理机制：让人机协同有制度保障

技术变了，管理模式不变，系统的价值就无法充分释放。深圳法院从两个维度推动管理机制革新。

一是实行类型化案件专业化审判机制改革。近些年，由速裁法官集中办理简单案件、简化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模式，在提高审判效率、破解案多人少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深度应用，繁简分流可与专业化审判更好融合，传统的“速裁快审”案件也具备了精细化审理的条件，裁判文书均能实现充分说理论证。在此背景下，深圳法院调整了案件繁简分流模式，实行类型化案件集中办理，全面回归专业化审判。2025 年 6 月，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建设提升审判质效专项行动方案》，对各业务部门收案数 60% 的类型化案件由专门法官集中办理，构建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又快又好的专业化审判机制，推动案件质量再提升、案件审理再加速、办案效果再优化。实践表明，实行类型化案件专业化审判，不仅审判效率有了保证，裁判标准也更加统一。

二是建立办案“良性循环”审判管理新机制。明确办案良性循环标准，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努力趋近“收多少案就结多少案”的理想状态。对办案良性循环实行动态管理、预警退出，充分赋予基层法院、审判执行部门和审判团队自我管理权限，达到办案良性循环标准的，由相关单位自行制定个性化任务方案；未达办案良性循环标准的，则由审判管理部门联合政工、督察部门介入，实现“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结果管理”向“过程管理”转变、“审管单管”向“审管、政工、督察共管”转变，有效调动各类审判主体的办案积极性和自驱力。

4. 积累人才与集体智能：让最优实践沉淀为系统能力

生态培育的最终目标，不是培养几个“AI 达人”，而是让全体司法人员的智慧持续汇聚、沉淀为系统能力，形成集体智能的不断积累与辐射。

系统目前已采用“智能体＋技能工具”的新技术范式。由业务骨干梳理常见案件类型、制作专业工具、确定文书套路、统一办理规范、编排生产链路、完善配套机制，将最优

实践和业务标准总结沉淀，转化为精准制导的标准化智能工具。一位法官摸索出的高效办案方法，经过提炼后成为系统中所有人可用的技能工具，个体经验由此转化为集体能力。

通过转变观念让法官愿用、培训技能让法官会用、革新管理让协同有制度保障、积累人才让最优实践持续沉淀，最终形成的是司法人员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研发—使用—反馈—优化”全链条的生态闭环。这片生态土壤不会因为某一次技术升级或人员变动而中断，它已经具备了自我更新、持续生长的能力，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六、数智原生的司法愿景

（一）全球司法工作的长期挑战和时代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技术深刻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大模型、自主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在政务服务、金融监管、医疗健康、教育科研、社会治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只是单一工具或辅助软件，而正在成为支撑各行业组织运行、流程再造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设施。司法领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面对并主动回应这一技术变革。

从全球范围看，案件持续增长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各国现代司法体系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例如，近年来，美国联邦法院、印度法院系统、巴西国家司法委员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发布的官方报告均表明，案件积压、法院拥堵、法官工作负荷持续增加以及案件审理周期延长已成为现代司法体系面临的重要治理问题。如何在有限司法资源下持续提升司法供给能力，已经成为全球法院共同探索的重要方向。美国联邦法院甚至建立了专门衡量司法资源紧张程度的“司法紧急状态”制度。当法官职位空缺叠加案件负荷超过一定标准时，即认定法院进入“司法紧急状态”，作为联邦层面优先补充法官资源的重要依据。其中，地区法院的认定标准包括每名法官加权案件量超过 600 件等情形。截至 2026 年 7 月，美国法院官方网站公布，全国共有 13 个司法紧急状态法院，其中部分法院每名法官年度加权案件量已超过 800 件，反映出部分法院长期承受较高案件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OECD Economic Surveys: Brazil》中将巴西法院长期面临的司法压力概括为高诉讼需求、案件拥堵、案件审理缓慢和法官工作负荷沉重。报告指出，巴西不同州法院普遍存在大量待审案件和新收案件集中于有限法官资源的现象，法院组织能力已成为影响案件积压的重要因素。根据巴西官方司法机构巴西国家司法委员会统计的全国法院案件数据，2018 年巴西每 100 名居民对应新收民商事案件约 10 件；全国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则由 1990 年的约 500 万件增长至 2017 年的 2900 万件，增长近五倍。受持续高位诉讼需求影响，巴西一审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 850 天。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通过优化法院组织结构、加强司法资源配置、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以及降低不必要诉讼需求等方式，缓解法院拥堵，提高司法系统运行效率。印度最高法院电子委员会建设的国家司法数据网实时

公布全国法院案件运行情况，截至 2026 年 3 月 13 日，全国地区法院和基层法院共有 49956834 件案件尚未审结。该数据网同时将案件积压监测作为支持司法管理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决策工具，为各级法院持续监测案件运行状况提供数据支持。

上述情况表明，诉讼案件量巨大、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审判压力持续增加，是现代司法体系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案件积压不仅会加重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负荷，影响司法人员身心健康和职业可持续发展，也可能导致案件办理周期延长、审判质量波动、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进而削弱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司法迟延在一定意义上即意味着正义迟延。如何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持续提升司法供给能力、保障裁判质量、扩大司法服务覆盖面，已经成为审判工作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在此背景下，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工作，提高司法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是技术发展与司法需求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和历史趋势。人工智能具有快速处理海量信息、识别和提取关键事实、辅助类案检索与法律研究、开展规则匹配和知识推理、生成裁判文书说理及其他结构化文本等功能，能够在大量重复性、事务性、基础性工作中释放人力资源，使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更具司法判断属性的核心工作。同时，人工智能并非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技术工具，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司法知识的组织者、提供者和辅助分析者，通过对法律规范、裁判规则、类案经验和司法政策的系统整合，为司法人员提供更加全面、及时、精准的知识支持和决策参考。人工智能辅助司法不是简单地“用机器替代人”，而是通过技术赋能推动司法资源配置方式、审判辅助方式和诉讼服务方式发生系统性优化。

与此同时，将人工智能主动、规范地引入司法工作内部，也是维护司法严肃性、公正性和安全性的现实要求。在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的背景下，社会公众、律师、企业法务乃至司法工作人员都可能接触并使用各类通用人工智能工具。如果法院不主动建设符合司法规律、满足安全要求、具备监管能力的内部人工智能辅助体系，司法人员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外部通用模型辅助查找资料、整理案情或起草文书。这种自发、分散、不可控的使用方式，可能带来多重风险：一是数据安全风险，案件材料、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国家秘密以及审判工作秘密可能在上传、调用、存储过程中被泄露；二是内容真实性风险，通用模型可能生成虚假法条、错误案例、失真事实或不准确推理；三是裁

判责任风险，人工智能参与程度不透明，可能影响裁判形成过程的可追溯性和责任归属；四是价值偏差风险，外部模型的训练数据、算法机制和输出偏好可能与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内在价值不完全一致；五是监管缺位风险，法院难以及时发现、评估和纠正不当使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因此，与其被动面对人工智能的外部冲击，不如主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法院治理体系和审判工作体系之中，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架构、权限控制、日志留痕、风险评估和责任机制，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规范、安全、可控应用。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重大技术突破往往爆发在顷刻之间，而人类社会重构组织形态、真正适应并充分运用新技术，则通常需要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时间。时不我待，面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司法系统必须主动加快这一进程。在遵循司法规律和审判权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坚持法官审慎行使审判权并承担司法责任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既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在提高效率、优化服务、辅助决策方面的积极价值，又审慎管控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程序风险。这是法院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回应公众司法需求的必然选择。

（二）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

深圳法院认为，在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工智能的辅助定位。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法官，但不能取代法官；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不能作出裁判结论；可以参与信息处理，但不能替代司法判断；可以提升办案效率，但不能弱化程序正义；可以促进裁判尺度统一，但不能僵化个案裁量。任何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设计、部署和使用，都必须以“法官依法独立判断、依法承担责任”为根本前提。在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应当明确并强化法官的最终决策权、审查义务和责任承担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可解释、可追溯、可审查、可控制的辅助地位。

在此基础上，应当以更具前瞻性的理念推动司法工作方式变革，即以“数智原生”为目标，重新思考和构建现代司法运行模式。“数智原生”，即数据原生与人工智能原生的有机结合，是指在法院业务体系、技术系统、工作流程和管理机制的设计中，不再将人工智能作为事后附加的单点工具，而是从一开始即将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能力作为核心要素，嵌入司法工作的整体架构、运行流程和制度规范之中。其本质不是在传统工

作方式之外增加一个“智能按钮”，而是围绕人工智能的能力特点和司法工作的内在规律，对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审判管理、司法公开、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进行流程再造、能力重塑和规则优化。

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意味着法院工作必须全面实现电子化、数据化和结构化。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基础是高质量数据。没有全面、准确、规范、可用的数据，人工智能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法院应当持续推进网上办案、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庭审记录智能化、执行信息数字化、诉讼服务在线化，推动案件材料、程序节点、裁判结果、执行进展、审判管理信息等形成统一、规范、可治理的数据资源。同时，应当加强司法数据标准建设，完善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存储、调用、共享、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知识注入、模型训练、效果评估和持续迭代提供可靠基础。

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意味着要以人工智能能力为核心重新审视司法人员的工作内容、岗位职责和协作模式。在传统审判模式下，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完成阅卷、摘录、检索、比对、归纳、起草、校对等工作。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这些工作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由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初步处理，司法人员则更多承担指令设计、结果审查、判断确认、质量把关和责任承担等职责。例如，在文书制作方面，法官从裁判文书的逐字起草者，逐步转变为裁判思路的构思者、说理结构的设计者、法律论证的审查者和最终内容的决定者；在证据审查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提取证据要素、标注争议焦点、发现证据之间的矛盾或印证关系，但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仍必须由法官依法作出；在法律适用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进行法条检索、类案推送、裁判规则归纳和量刑区间提示，但法律解释、规则选择和个案衡量仍应由法官完成。

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意味着司法人员应当具备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的能力。未来的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审判管理人员，不仅要熟悉法律规范、诉讼程序和审判业务，也需要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适用场景、使用边界和风险特征。司法人员应当掌握通过人工智能快速阅读和理解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多类型材料的能力，善于运用智能工具开展类案检索、争点整理、文书校核、庭审准备和审判管理。同时，司法人员还应当具备必要的提示词设计、输出结果核验、风险识别和偏差纠正能力，能够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准确、完整、合法、适当。对于条件成熟的领域，业务骨

干还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开发者，与技术团队共同梳理业务规则、设计应用场景、标注训练数据、优化模型效果，推动形成真正符合司法需求的智能化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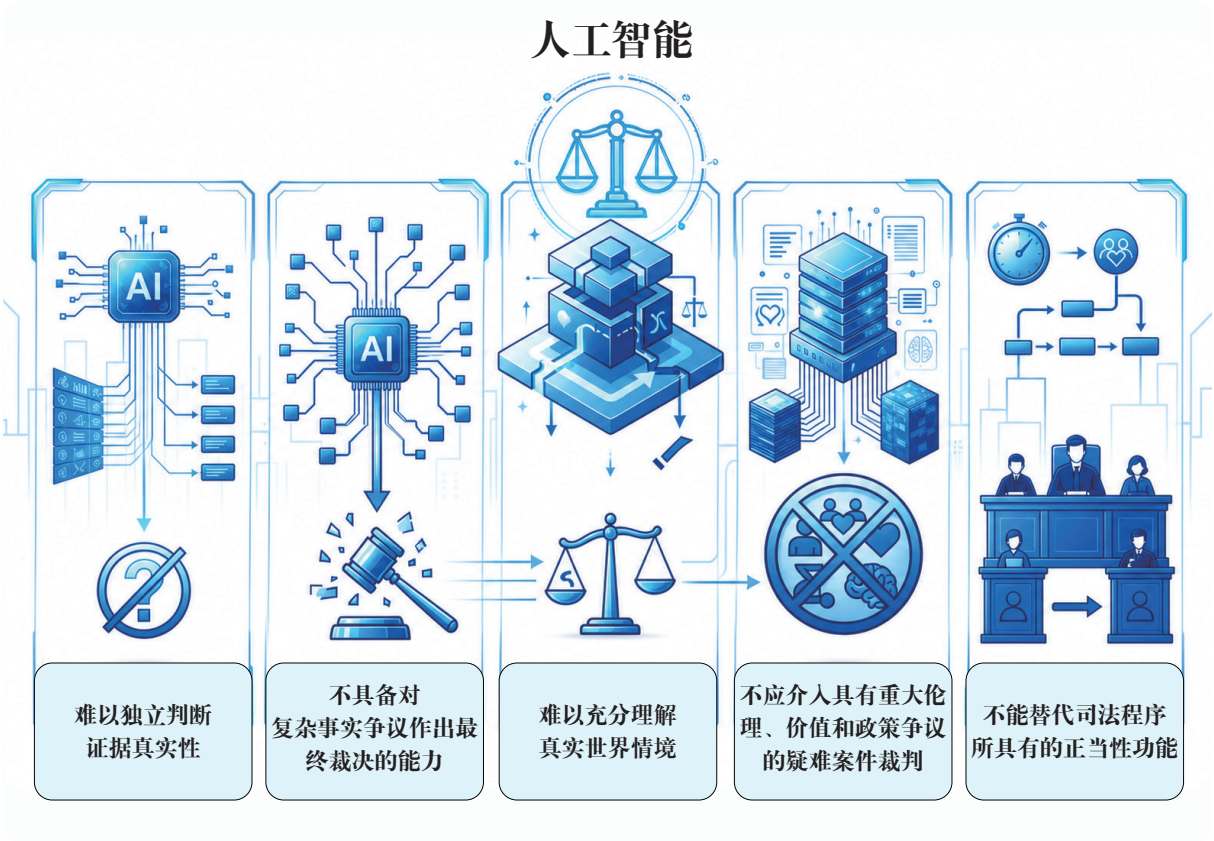
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意味着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应当深度嵌入法院业务流程，而不是停留在孤立、零散、浅层的工具使用。人工智能应当围绕案件全生命周期发挥作用，从辅助各个单项任务迈向驱动整体流程，推动案件办理方式发生系统性变革：在诉前阶段，辅助开展法律咨询、诉讼风险提示、纠纷分流、多元解纷和材料预审；在立案阶段，辅助进行材料识别、案由识别、管辖审查、要素提取和程序分流；在审理阶段，辅助阅卷、争点归纳、庭审提纲生成、类案检索、法律适用提示、文书起草和文书校验；在执行阶段，辅助财产线索分析、执行风险识别、执行措施建议和终本案件管理；在审判管理阶段，辅助案件态势分析、质效评估、审限预警、裁判偏离监测和类案裁判规则梳理。通过全流程、体系化、场景化应用，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法院运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发展趋势，全流程办案辅助智能体、多智能体协同和司法知识持续沉淀等新型能力，将逐步成为“数智原生”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圳法院期待：未来，人工智能将嵌入案件办理整体流程，推动司法工作由“人工主导、智能辅助”逐步迈向“人机协同、智能驱动”的新型工作模式，实现司法“生产方式”的整体跃升。司法经验将持续沉淀为人工智能的固有能力，推动司法知识向生产力持续转化。多智能体协同将成为司法智能化的重要形态，主动规划大量司法工作内容，推动形成“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

当然，打造“数智原生”的司法工作方式，并不意味着对人工智能能力作无限扩张

理解，更不意味着将司法判断交由人工智能完成。恰恰相反，越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应用，越需要清醒认识其能力边界，越需要明确司法辅助功能的底线。当前，现有大语言模型和相关人工智能系统在法律文本理解、信息检索、文书生成、要素抽取、语言表达等方面已经展现出较强能力，并且随着技术迭代，其能力仍将持续增强。但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人工智能仍难以全面胜任司法工作中的若干核心任务。



一是人工智能难以独立判断证据真实性。司法证明活动不仅涉及证据内容本身，还涉及证据来源、形成过程、收集程序、当事人陈述、证人可信度、庭审质证情况以及经验法则等复杂因素。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整理证据、提取信息、比对矛盾、提示关联，但不能替代法官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进行综合判断。

二是人工智能不具备对复杂事实争议作出最终裁决的能力。事实认定往往需要在不完整、不确定甚至相互冲突的证据之间进行综合衡量，需要结合法庭调查、当事人举证

质证、法官心证形成以及证明标准要求。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法官发现事实线索、构建事实时间轴、梳理争议焦点，但不能替代法官形成内心确信，也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最终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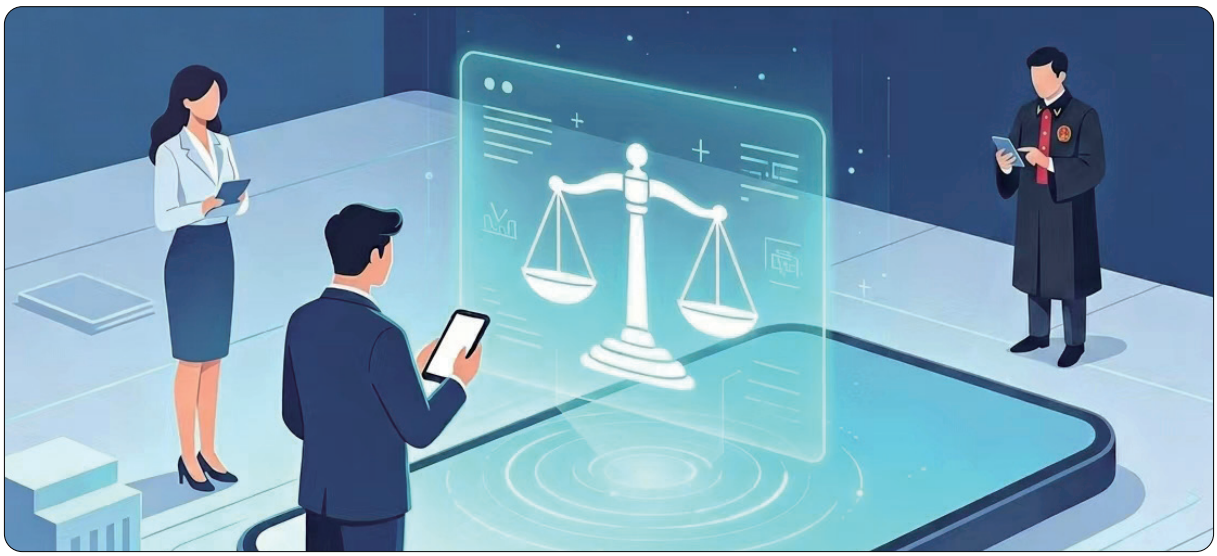
三是人工智能尚难以充分理解真实世界情境。许多法律标准的适用依赖对物理世界、社会生活和行业惯例的综合认知，例如“合理注意义务”“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明显不当”“必要限度”“通常标准”等。这些判断不仅是文本匹配问题，更涉及经验、语境、常识、社会评价和制度目的。现阶段人工智能尚缺乏稳定可靠的“世界模型”，难以独立完成需要深度现实认知的法律评价。

四是人工智能不应介入具有重大伦理、价值和政策争议的疑难案件裁判。部分案件可能涉及人格尊严、家庭伦理、公共利益、社会政策、弱势群体保护、基本权利冲突等复杂价值衡量。这类案件的裁判不仅是法律适用问题，更体现司法机关在宪法法律框架内对公平正义、公共秩序和社会价值的审慎判断。人工智能可以提供资料检索和比较研究支持，但不应生成或决定价值判断结论。

五是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司法程序所具有的正当性功能。司法裁判的权威不仅来源于结论的正确性，也来源于程序的公开、公平、参与、对抗和可说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陈述、法官释明、合议评议等程序环节，是当事人参与司法、表达意见、接受裁判的重要制度安排。人工智能不能以效率之名压缩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也不能以算法判断替代依法进行的审判程序。

面向未来，法院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应当立足司法规律和技术趋势，以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为目标。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法院工作，使人民群众在更加便捷、高效、普惠、透明的司法服务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建设智慧便捷的在线诉讼服务体系



发展在线诉讼，是数字和智能时代司法运行方式变革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更加便捷、高效、普惠、公正司法服务的现实期待。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人民群众参与诉讼的方式、获取司法服务的习惯以及对司法效率和司法透明度的要求，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线诉讼不再只是线下诉讼活动的简单线上迁移，而应当成为重塑诉讼流程、优化诉讼体验、提升审判质效、促进实质解纷的重要载体。

当前，深圳法院已经基本实现诉讼全流程数字化，在网上立案、在线缴费、电子送达、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电子卷宗、电子签章、网上阅卷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应用基础。下一步，如何在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智能化，以人工智能赋能在线诉讼服务，推动司法服务从“能在线办理”向“好在线办理”“智能化办理”“精准化办理”转变，是数字法庭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逻辑起点。

1. 推动司法人工智能由全社会共享，提升在线诉讼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

数字法庭本质上是连接公众与法院的“双边平台”：一端连接司法服务的供给者，即法院、法官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另一端连接司法服务的需求者，即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不仅可以赋能法官和法院内部工作流程，提高司法服务供给能力，也可以通过数字法庭，进一步将赋能的时空节点前移至诉讼服

务最前端，使人民群众在立案、举证、质证、庭审、调解、申请、送达、阅卷等诉讼全过程中，都能够直接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效率。

未来的数字法庭，应当围绕群众在线诉讼中的高频需求、痛点问题和操作障碍，研发更加智能、友好、可理解的在线诉讼引导系统。通过智能问答、流程导航、材料清单生成、风险提示、节点提醒等功能，为当事人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精准化的诉讼服务。进一步提升在线举证、在线质证、在线提交申请和补充材料的智能化水平。对于当事人上传的合同、发票、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照片、视频、鉴定意见等材料，系统可以辅助进行格式识别、内容提取、要素标注、时间排序和证据分类，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更加完整、清晰、有效的证据材料。对于证据材料存在缺漏、模糊、重复、关联性不明等情形的，探索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适度提示，在不影响当事人诉讼主体性、不逾越法院职权的前提下，帮助当事人提高举证质量，也帮助法官提高阅卷和审理效率。

应当探索为当事人提供大语言模型与可检索法律知识库相结合的智能服务。通过接入经审核、可追溯、权威可靠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类案裁判规则和诉讼指引，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依据查询、类案参考、证据整理、诉讼请求规范表达、争议焦点梳理等辅助服务。需要强调的是，此类智能服务应当定位于公共法律信息服务和诉讼辅助服务，不得替代律师等专业法律服务，不得对案件裁判结果作确定性承诺，也不得误导当事人形成不合理预期。

同时，发展在线诉讼必须高度重视数字鸿沟问题。在线诉讼的价值不在于单纯追求技术先进，而在于让更多人民群众更加公平、便利地接近司法。对于老年人、残障人士、文化程度较低人员以及其他不熟悉数字技术的诉讼群体，应当提供更加充分的技术协助和替代性服务。

2. 以“可预期正义”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正不仅要求裁判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真相，也要求裁判形成过程公开、透明、可参与、可理解。诉讼活动不是法院单方行使审判权的封闭过程，而是当事人依法参与、表达意见、举证质证、进行辩论，并由法院在程序保障基础上作出裁判的制度化过程。在线诉讼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增强当事人诉讼参与、提升司法过程透明度、促进裁判结果可理解和可预期，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

“可预期正义”，并不是让当事人在诉讼开始时即可确定知道裁判结果，而是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程序引导、规则说明和互动反馈，使当事人能够了解诉讼程序如何推进、法院将围绕哪些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哪些事实需要证明、哪些法律规范可能适用、自己的意见是否被充分听取和认真考虑。通过提升诉讼过程的可理解性和裁判形成的可说明性，减少当事人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和对抗，增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度和信服度。

在线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平台填报、确认、补充和提交案件相关信息及材料。数字法庭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当事人提交的非结构化材料进行智能识别和结构化处理，辅助生成案件基本事实、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争议焦点、证据目录、法律依据、类案参考等内容。系统可以将处理后的派生数据和初步归纳结果在线反馈给当事人确认，并征询各方意见。对于事实复杂、争点较多或者当事人表述不清的案件，还可以借助智能体开展多轮交互，引导当事人围绕关键事实、核心争议和证据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这一机制的意义在于：第一，可以将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过程，同步转化为普法宣传和诉讼能力提升的过程。当事人在系统引导下逐步理解诉讼请求、证明责任、证据规则、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有助于形成更加理性、规范的诉讼行为。第二，可以增强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理解，使其对案件走向和裁判结果形成更加合理的预期，减少因程序陌生、规则不明或沟通不足引发的不满。第三，可以通过“人在回路”的确认机制，提高案件数据和信息归纳的准确性。系统生成的事实摘要、争议焦点和证据整理结果，必须经过当事人反馈、法官审查和程序确认，才能作为审判辅助参考，从而最大限度排除信息误差，促进事实查明。第四，可以使法官在庭前更加全面、准确地掌握案件全貌，提高庭审针对性和裁判说理质量。

同时，应当推动裁判说理的智能辅助与在线释法相结合。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法官检查裁判文书中事实认定是否完整、争议焦点回应是否充分、法律依据引用是否准确、说理结构是否清晰、类案裁判尺度是否一致。在裁判作出后，可以探索通过在线平台提供裁判要点提示、法律依据说明、履行义务提醒、上诉权利告知等服务，帮助当事人理解裁判内容和后续程序安排。通过全过程、可视化、互动式的司法服务，推动人民群众不仅“得到裁判”，更能够“理解裁判”“信服裁判”。

3. 数智赋能促进程序正义与审判效率的互相促进与统一

数智赋能在线诉讼，不仅是为了提高案件处理速度，更是为了通过流程优化、资源重配和程序强化，使司法效率与程序正义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真正现代化的司法供给能力，应当体现为更快的响应、更精准的服务、更充分的程序保障和更高质量的裁判结果。

应当探索建立“分布式庭前准备 + 集中庭审”的工作机制。“分布式庭前准备”，即将原本大量集中在庭审现场完成的事实梳理、证据交换、争点归纳、程序告知、调解沟通等工作，借助在线平台和智能工具前移至庭前，并以异步、分散、可留痕的方式持续推进。“集中庭审”，即在庭前准备充分、争议焦点明确、证据材料固定、程序事项清晰的基础上，将庭审活动聚焦于核心争议、关键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提高庭审实质化水平。

这一机制有助于推动法官办案方式从传统的“一个案件审完再审下一个”向“多案并行、节点推进、集中裁判”转变。对于法官而言，可以在系统辅助下同时推进多个案件的庭前准备工作，根据案件成熟程度安排庭审和裁判，大幅减少等待时间和程序空转，提高司法资源利用效率。对于当事人而言，可以更加灵活地在线提交材料、发表意见和参与程序，减少往返法院、等待排期带来的时间成本。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可以实现审判资源、辅助事务和技术能力的优化配置，提升案件周转效率和司法供给能力。

更重要的是，庭前准备越充分，庭审焦点越明确，程序参与越充分，当事人越能感受到自己的意见被认真倾听、诉求被纳入审理框架、证据被充分审查、裁判是在各方充分表达和对话基础上作出的。这样的诉讼过程不仅有助于法官更加准确地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度，减少上诉、申诉和信访，推动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四）拓展司法人工智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功能

法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审判通过定分止争、确认规则、评价行为、修复秩序，既解决个案纠纷，也向社会传递价值导向。司法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应局限于法院内部审判执行活动，也不应仅服务于个案办理。司法过程长期积累了大量法律知识、裁判规则、类案经验、纠纷样态和治理信息，这些知识和数据不仅能够帮助法官、司法辅助人员更好地办理案件、当事人更好地参与诉讼，也可以在依法合规、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向公共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社会风险预警和基层治理等领域延伸，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精细化水平的重要资源。

1. 司法人工智能能够提升公共法律供给，促进法律知识普惠共享

司法过程中沉淀的法律知识、裁判规则和办案经验，具有高度专业性、实践性和权威性。通过真实司法工作不断积累、校验和打磨形成的人工智能模型、知识库和智能体，可以在适当范围内用于普法宣传、法律咨询辅助、诉讼风险提示、纠纷解决指引等公共法律服务场景，帮助社会公众更加便利地获取基础法律知识和行为规范指引。

应当探索建设面向公众的司法知识服务平台，有效降低人民群众获取法律信息的门槛，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面和精准度。司法人工智能可以基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典型案例、类案裁判规则、诉讼指南、常见纠纷问答等权威资源，提供智能问答、案例检索、风险提示、诉讼流程说明、证据准备指引、调解建议等服务。对于高频民生纠纷，系统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人民群众说明相关法律规则、常见争议焦点、证明责任分配、可选择的解纷路径和诉讼注意事项，帮助人民群众在纠纷发生早期即形成理性判断。

2. 司法人工智能能够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促进纠纷消解于诉前

司法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服务已经进入法院的案件，也可以服务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潜在纠纷。通过对常见纠纷类型、裁判规则、调解经验和诉讼风险的智能分析，可以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仲裁、公证、基层治理组织等提供辅助支持，推动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诉前、化解在萌芽状态。人工智能还可以为调解人员提供类案参考、规则提示、调解方案辅助生成、履行风险提示等支持。对于适宜调解的案件，在事实相对清楚、争点相对明确、法律后果相对可预期的基础上，司法人工

智能可以引导当事人理性评估诉讼成本、时间成本和履行风险，推动形成更具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调解方案。

3.“数智原生”的司法过程，可以通过加强数据分析反馈，助力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

法院不是孤立的司法审判机关，诉讼活动深嵌于社会经济环境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司法数据集中反映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和治理短板。通过对司法数据进行依法合规的汇集、清洗、分析和研判，可以发现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特定区域中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为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依托司法数据，政府可以围绕类案高发领域、重点行业风险、基层治理难点等开展分析研判，及时发现纠纷高发原因，特别是制度供给不足。同时，司法人工智能还可以在行政执法规范化、公共政策完善和科学立法中发挥辅助作用。



结语

让技术走向人，让正义更可及

人工智能进入司法，不是为了让司法变得冰冷，也不是为了把裁判交给机器。恰恰相反，它的真正价值，是把法官从大量重复性、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法官有更多时间倾听陈述，更深入地查明事实，更充分地阐释法律，更审慎地作出判断；也是让群众少跑一次路、少等一段时间、少一些不确定，多一分便利、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对公平正义的信任。

深圳法院期待并将持续推动建设“数智原生”的法院形态。我们相信这是司法工作的未来图景。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中可以预期，“数智原生”的法院，不只是对诉讼流程和法官办案流程的优化，更可能深层次改变司法程序的组织方式、司法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司法判断的形成机制。面向这一未来，我们需要从今天开始共同思考、持续探索，也诚挚期待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其中，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司法工作的创新发展。

附录

附录 1：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 V2.0（2026 年 9 月）

附录 2：术语定义

附录 3：大事记

附录 1　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

一页速览——构建审慎融合、严防风险、科学应用的治理框架

为何需要规范四类新风险

- **权责僭越**：司法核心职权"空心化"
- **指令污染**：任务目标被恶意扭曲
- **过程失范**：执行链偏离规范轨道
- **系统失控**：权限滥用与级联故障

四项正向原则

审慎融合 —— 智能体技术司法应用的四项研发及应用原则

原则一
锚定辅助工具定位
法官决策在环路，坚持亲历性原则，不允许 AI 以任何方式替代法官裁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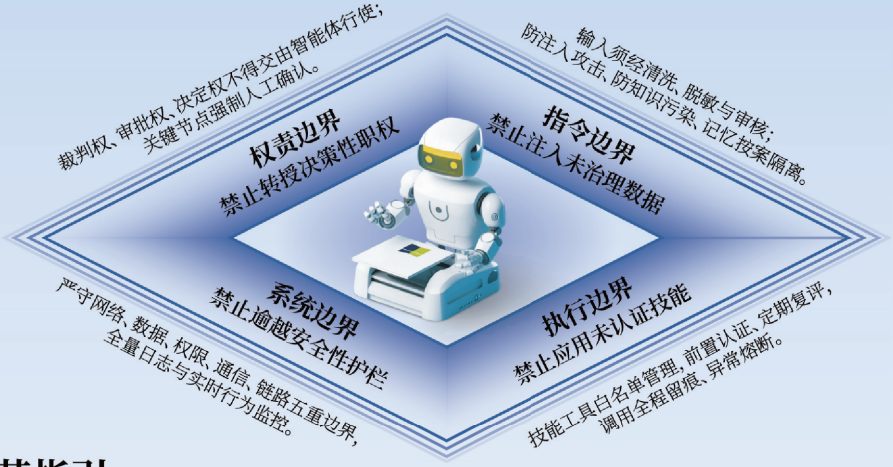
原则二
深度融入审判环节
契合审判规律与办案习惯，多模型引擎 + 业务系统 + 权威知识库深度融合。

原则三
同步落实司法责任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预设审核确认环节，决策过程同步留痕。

原则四
全程确保数据安全
专网部署、封闭运行，训练、推理、应用全生命周期严守数据安全红线。

四项负面清单

严防风险 —— 以禁止性行为框定安全底线与应用红线



四阶段规范指引

科学应用 —— 司法使用者驾驭智能体的分步方法

阶段一 定义任务
目标 + 上下文 + 技能 + 产出 + 约束，五要素齐全。
—— 定得准

阶段二 监督过程
查执行步骤、技能调用、引用来源，有无跳步。
—— 看得透

阶段三 核验输出
核事实、法条、案例、逻辑、口径，分级循证。
—— 核得严

阶段四 驾驭环路
纠错、收紧、校准、补料，迭代收敛、经验沉淀。
—— 改得勤

运行 — 核验 — 修正 — 再运行，逐步收敛结果

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

一、引言

本指南旨在为法官及司法工作人员提供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引，并为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供参照。指南强调智能体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方法应用的辅助性、规范性、安全性及权责一致性，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在提升审判质效的同时，严守司法伦理、数据安全与公平正义的底线。

智能体技术是指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制定决策并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定目标的智能系统。在司法语境下，特指为完成特定审判辅助任务而设计的智能化模块或系统。当前，随着自主智能体技术的能力突破，已经能够基于大语言模型、智能工作流（Agentic Workflow）、交互式思考（Interleaved Thinking）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根据目标自主进行任务规划、分步推理、技能工具调用与环境交互。其“自主性”体现在为完成任务而动态制定策略与步骤的能力。

二、未来已来：直面智能体技术司法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2026 年以来，以智能体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显著进展，其强大的任务规划与执行灵活性为司法领域带来新的赋能机遇，体现在：显著提升效率——可自动、批量处理文书送达、信息录入、简单查询等重复性事务；灵活响应需求——能更低成本、更灵活地响应个性化的案件管理或当事人服务需求；降低研发门槛——通过模块化、可编排、预定义的智能体，降低复杂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与部署难度。

智能体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其高度的自主性与交互性引入了新的、不容忽视的风险，若管控不当，将对司法程序、责任体系与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冲击，主要表现在：

（一）权责僭越风险：司法核心职权面临“空心化”

存在核心司法职权被不当转移的潜在可能。法官可能因对智能体能力的错误认知或便利性依赖，过度授权，例如：

结果导向的过度委托：仅下达最终任务指令（如法官直接指令“生成判决书”），

忽视中间的事实认定与法律推理步骤，导致决策过程“黑箱化”。

权责不清的全面外包：未加区分地将证据审查、事实判断等本应亲历性的司法核心工作交由智能体处理，形成事实上的“自动化裁判链”，架空司法责任制。

（二）指令污染风险：任务目标在“自主”中被恶意扭曲

任务指令在复杂执行过程中存在被曲解、篡改的风险。智能体实现“自主性”的关键在于中间步骤的“信息自主”，使得智能体收到的任务指令、读取的上下文、调用技能工具的返回值均可能在传递过程中被污染或篡改，进而让真实任务目标被恶意改写。例如：

使用者越界攻击：使用者（包括诉讼当事人借助代理工具或文本材料）可能尝试绕过智能体内置的安全约束，通过角色扮演、编码绕过、多轮逐步诱导、系统提示泄露等方法诱使智能体做出本应拒绝的行为，即业界所称的“越狱”类攻击。司法场景下需特别防范使用者通过递交材料、诱导提问、设置个性化参数等方式进行深层攻击。

第三方指令注入：第三方内容可能被植入恶意指令，诱导智能体读取并执行；第三方内容可能包括以图像、音频、扫描件等非文本形式承载的指令隐写，试图绕过普通文本过滤进入智能体任务。

知识与记忆污染：诉讼材料中包含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法条、虚构案例等不实信息，若不加甄别地将此类“污染知识”纳入任务上下文，将导致基于错误前提的推理与输出；具备长期记忆能力的智能体，一次任务中被植入的错误或恶意内容可能跨会话持续影响后续所有任务，形成“慢性污染”。

（三）过程失范风险：动态执行链偏离规范轨道

智能体为完成任务而动态调用的技能工具及自生成的执行步骤，可能偏离法定程序或内部规范。例如：

工序不可验证：智能体自主调用外部技能工具或者自行制造工具，导致生成中间步骤的过程可能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难以审计和验证其合规性。

技能违规引入：智能体调用或自主创设的某个技能工具本身可能包含错误逻辑、恶

意代码或不符合司法程序的规定，导致任务执行在表面上完成，实则违反了办案规范，带来程序性风险。这一风险在能力组件的供应链上尤其突出：打包分发的扩展、第三方提供的工具接口、智能体通过代码创建的组件、动态派生的子智能体等均可能成为污染链路的入口；恶意能力组件可能完全绕过运行时安全策略，在策略引擎的管辖范围之外运作，传统安全审查难以覆盖。

（四）系统失控风险：权限滥用与级联故障放大危害

智能体获得系统操作权限后，可能引发越权操作、数据泄露等安全隐患。例如：

高权限误操作：智能体在权限边界不清、异常情形识别不足的情况下，可能错误调用高权限接口或触发关键业务流程，对案件审理造成难以挽回的干扰或损害。

数据边界渗透：在跨系统或多数据源场景下，智能体可能为完成任务而尝试访问其权限范围之外的敏感数据，造成数据越界访问与泄露风险。

多智能体级联错误：在多智能体协同场景下，单个智能体的异常操作可能通过任务分派与跨组件调用链路引发连锁错误，进一步放大影响半径。

三、审慎融合：坚持智能体技术司法应用的“正向原则”

智能体技术是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组合创新产物，即使其展现出了更强的自主能力，其应用必须继续遵循前期中国法院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探索实践中沉淀的四项研发及应用原则，即，一方面鼓励以“大胆探索、审慎应用”的态度开展创新实践，引导法院系统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另一方面保持清醒的技术定位认知，坚决避免出现“机器代替法官”“科幻式融合”“黑箱式应用”的认识误区，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审判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目标。

（一）锚定辅助工具定位

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应用应当严格划定人机协作关系的基础伦理界限，明确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工具属性。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始终坚持尊重法官自主决策权，全过程充分贯彻“亲历性原则”，不允许人工智能以任何方式替代法官作出裁判，在辅助工具研发和应用中确保“法官决策在环路”。

（二）深度融入审判环节

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应用应当深度契合审判工作规律与法官办案习惯。通过“通专结合多模型引擎 + 司法业务系统工程 + 权威法律知识库”的工程化应用模式，以司法业务思维方法专属的驾驭工程牵引人工智能技术组合方式，精准识别各类案件核心办理环节的难点任务，围绕各类案件的业务标准框架进行设计，精准交付能满足司法人员工作需要的辅助结果，实现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三）同步落实司法责任

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应用应当始终坚持责任归属的明确到人，确保权责清晰。辅助工具必须预先设置必要的法官审核、确认与决策环节，确保案件的判断决策由裁判者做出，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智能体技术可全程提供决策辅助，知识推送、辅助生成，但必须采取必要方式同步记录决策过程，促进法官审慎司法，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原则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全面贯彻。

（四）全程确保数据安全

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应用应当贯彻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严格保障司法数据安全。在系统设计、技术方案和管理制度上，辅助工具应始终将数据安全视为研发工作红线，全面采取专网部署、专人管理、专门安全架构等方式，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训练、微调、推理、应用所涉及司法数据、交互信息及生成内容均在封闭的内网环境中安全运行、封闭处理，从根本上杜绝敏感数据外泄风险。

四、严防风险：框定智能体技术司法应用的“负面清单”

自主智能体等技术的发展既提高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能力上限，也带来了更多维度的安全风险，但非必要的安全约束也可能限制智能体技术的能力发挥。为平衡智能体技术的应用潜力与安全风险，在遵循前述四项一般原则基础上，提出以下四项“负面清单”，以明确的禁止性行为框定安全底线和应用红线。清单旨在为智能体技术的司法应用划定明确的禁区，在坚守安全、伦理与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有益的技术创新与探索保留合理空间。

（一）禁止转授决策性职权

任何情况下，不得将裁判权、审批权、决定权等核心司法决策职权交由智能体行使。必须始终坚持“法官决策、智能体执行”的根本模式，所有实质性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裁判结论必须由法官明确作出。为此，需通过技术手段严格禁止智能体以“裁判建议”“一键生成结论”等形式提供替代性决策方案，系统应对用户的此类指令进行有效引导与拦截。在涉及多个步骤的智能工作流设计中，必须保留并强制经过所有关键决策节点的人工确认环节，坚决杜绝形成跳过人工判断的自动化链路，避免任何形式的黑箱式、误导性决策。

（二）禁止注入未治理数据

不得使用未经清洗、脱敏、合规与安全审查的原始数据直接训练智能体或作为其执行任务的上下文信息。所有输入智能体的提示词、案件材料、知识信息等，必须经过严格的来源审核、内容清洗、知识核验、敏感信息识别与处理等全流程治理。必须建立有效机制防范“指令注入攻击”，原则上禁止将未经结构化提取的原始诉讼材料直接作为智能体的任务输入，从源头切断恶意指令的注入途径。同时，应确保智能体进行法律推理所依据的知识必须直接来源于经过认证的权威知识库，并对诉讼材料中可能存在的虚假法律信息进行识别与警示，严防“知识污染”。此外，对智能体调用外部技能工具所获取内容，包括检索所得网页文本等第三方信息，须实施指令过滤与格式隔离。对使用者的直接输入实施安全过滤与越狱攻击检测，拒绝明显的越狱式诱导指令。对智能体的长期记忆、跨会话状态、决策缓存等实施定期清洗、按案件隔离、按任务清零，防止一次攻击跨会话扩散形成慢性污染。

（三）禁止应用未认证技能

不得允许智能体调用未经安全评估、功能认证与合规审核的外部工具、插件或能力组件。系统应对所有可调用技能实行严格的白名单管理制度，严禁用户自行安装或配置未经验证的第三方技能。需通过技术手段限制智能体自行创建或从外部获取新技能的能力，将其行动范围牢固约束在预先审核通过的工具集内。智能体及能力组件须经校验后方可加载；对被调用能力组件及被激活子智能体作完整性验证。必须建立统一的技能管理机制，由技术管理部门与审判管理部门共同负责，对拟上线的技能进行前置安全认证、

功能合规性审查与上线后的定期复评，同步建立变更审批与回滚机制。所有技能的调用必须全程留痕，形成完整、可审计的追踪链条。此外，建立智能体运行的实时监控与异常检测机制，一旦发现能力组件调用偏离预期轨迹或触发安全阈值，系统应自动中断当前任务链路并回滚至安全状态，同时通知审判主体介入处置。

（四）禁止逾越安全性护栏

不得绕过或破坏系统为智能体设置的网络隔离、权限控制、数据访问边界、操作审计及风险熔断等安全防护机制。智能体必须在严格的网络隔离环境下运行，严禁擅自访问外部网络或进行跨安全域通信，严守网络边界。必须实施严格的数据分级分类与最小权限访问控制，智能体只能接触完成当前任务所必需且经过脱敏处理的、在用户权限范围内的数据，严守数据边界。智能体的操作权限必须与用户身份紧密绑定，并遵循“随案授权”“按岗授权”原则，为其执行的每项任务创建独立的“安全沙箱”环境，防止权限滥用与横向移动，严守权限边界。在多智能体协同场景中，智能体之间的消息传递必须通过经认证的加密通道进行；禁止智能体之间使用未经认证的通信方式或绕过通信中间件直接交互；对智能体间通信实施协议版本管控，禁止降级至不安全的通信协议，严守通信边界。针对多智能体任务链路中的级联失败风险，建立任务级和系统级熔断机制，当单个智能体出现异常行为（如输出格式异常、置信度低于阈值、响应超时）时，自动暂停该智能体及其下游的整条任务链路，隔离故障节点并通知人员介入，严守链路边界。此外，必须对智能体的所有操作进行全量日志记录与实时行为监控，并设立异常操作风险预警与自动阻断机制，实施严格的行为监控。

五、科学应用：司法场景驾驭智能体技术的“规范指引”



随着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的融合持续深化，以自主智能体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正加速融入司法工作全流程，在显著拓展人机协同边界、提升智能辅助能力的同时，也对司法场景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应用门槛。在司法这一“高利害”“严控制”“精输出”的场景，除了司法人员必须使用专网部署、官方认证、安全合规的智能工具处理案件信息等基本要求之外，使用者能否有效驾驭各类智能体技术，已成为直接关系到公正与效率的关键能力。在未来的司法场景中，智能体技术使用者必将出现“会用者赋能、误用者负能、善用者驭能”的发展趋势。因此，为司法人员有效驾驭智能体技术建立规范指引，帮助理解智能体技术的基础原理与要求，既是新技术稳慎应用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司法权规范运行的必然要求。

本指引从司法使用者的视角，将司法场景的智能体使用方法简要归纳为定义任务、监督过程、核验输出、驾驭环路四阶段的分步指引，指引司法使用者更好驾驭智能体能力，助力将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安全可控地转化为公正高效的司法触达。

（一）定义任务（Define the Task）

任务清晰明确，才可能得到智能体的有效执行，司法场景对精确性的追求始于对智能体任务的精准定义。一条含混的任务指令可能导致智能体跳过关键的法律知识准入、法官决策注入、案件事实核验步骤，或在缺乏限定的情况下自主引用未经审核的信息，

导致偏差累积、结果偏差和错误依赖。因此，司法使用者应当从任务选型、明确内容、完善输入、明确边界、约定格式方面加以规范。

1. 确定任务选型：在司法场景中，涉及司法责任核心事项一般已由系统开发者采取预定义任务或者智能工作流的稳慎应用方法进行设定，进而确保应用链路的规范、透明、可解释和可问责。司法场景使用者应当优先使用经官方设定的规范辅助方式，并按照预定义任务和智能工作流的具体设计，完成材料筛选、信息核验、知识准入、决策注入、输出核验等规范步骤。在使用智能体个性指令任务对涉及司法责任核心事项进行注入或者修改时，必须加倍关注并履行智能体安全应用要求，严格履行定义任务、监督过程、核验输出、驾驭环路四阶段的稳慎义务，并且经过严格的人工审核方可回填或注入至司法责任核心事项。

2. 明确任务内容：在司法场景中，使用者会通过设定个性指令任务的方式围绕案件进行法律研究、信息归纳和穿透调查。司法场景使用者应当清楚认知其定义的任务内容将直接影响智能体交付结果。一个精准的任务内容应当包含明确的任务目标、上下文范围、技能工具、预期产出和必要约束。指令的具体程度直接决定智能体规划路径的质量，笼统的指令会给智能体留下过大的自主规划空间，增加任务失范、偏离预期和结果错漏的风险。

3. 完善任务输入：在司法场景中，任务上下文的完整性、准确性将关乎任务推理的前提完备和推理聚焦。司法场景使用者应当具备智能体任务上下文管理意识，尽可能提供完整准确的上下文信息，并对提供方式进行专业控制。任务包含的案件材料等上下文应当经过筛选整理，去除无关信息，并通过信息填入、材料选定、检索指令等方式突出关键信息，避免因信息输入过载、关键前提缺位或者上下文污染，造成偏差累积、自主假设等风险。

4. 设定必要约束：在司法场景中，系统开发者一般已经集成一定约束条件，以实现对诱发幻觉、过度授权等行为的边界控制。但司法场景使用者仍应具备安全边界控制的知识与能力，清楚地认识到：在任务中针对智能体行为设定禁止性约束，对于智能体交付结果的可信度同样重要。使用者应当在任务中明确设定相关禁止性约束，既有效框定智能体的行动空间，减少越权行为，也减少任务执行偏离预期的情况，降低核对成本。

5. 约定输出格式：在司法场景中，任务的最终成果一般需要以固定的体例输出以方便后续环节的核对及使用。司法场景使用者可以要求智能体按照特定格式、体例、论证结构输出，比如明确要求列明法条依据、标注信息来源、分段呈现推理过程、制作可视化表格。这有助于后续核查工作的开展，也便于发现智能体的偏差步骤，方便继续修改完善，并妥善地应用于文书等后续环节。

例 1（示范）：任务为“请根据附上的庭审笔录与证据清单（上下文），整理一份案件争议点的清单（任务目标），案件争议点的整理逻辑是将庭审中当事人有不同意见的要点分点列举，同时逐项核对已上传的证据材料，将相关证据与争议点一一对应，同时检索相关法条，与争议点一一对应（技能工具）；注意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请检索当时生效的法律、说明版本并溯源至权威数据库，以方便核对的方式展现（必要约束），请以表格的方式呈现（预期产出）。”

例 2（纠偏）：任务为“帮我写这个案件的裁判文书”，该任务目标模糊、上下文不明、决策不明、约束不明、格式不明，这在深圳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的智能体应用中会被视为“转授决策性职权”而被拒绝服务。因为，即使是法官布置的任务，机器也不能以执行任务的名义在事实上代替法官决策，同时这种使用方式会让模型为了完成目标而编造上下文或者引入幻觉，加大信息错误、推理谬误、黑箱链路的风险。

（二）监督过程（Supervise the Process）

精准定义的任务，同样需要精准的执行与监督，这与司法场景中的审判权运行方式一致。智能体在执行任务时会自主理解任务、分解步骤、调用工具、生成中间结果、逐步完成推理，因此更加方便追溯和监督。与传统“输入—输出”式工具不同，智能体的执行过程是可视和动态的，每一步的结果都可能影响下一步的方向。如果使用者只关注最终输出而忽视中间过程，就无法及时发现智能体是否走上了错误的路径，导致偏差被下意识采纳并接受，这将与司法场景的审慎要求相违背。因此，司法场景使用者需要理解自主智能体的应用原理，理解智能体任务的信息对齐、过程执行和节点介入的重要性，掌握监控任务执行的基本方法。

1. 确保任务对齐：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一般会展示任务步骤、

材料读取、技能工具调用、依据来源等可见执行记录。鉴于将任务内容准确传递至智能体上下文窗口是任务得到准确执行的前提，司法场景使用者应当首先确保其定义的任务内容的全面对齐，包括但不限于：任务的各项指令是否得到有效注入且不存在遗漏；知识原文、材料文本等上下文信息是否得到有效输入；任务内容有无得到智能体的准确理解并在后续规划中遵循。

2. 监控执行过程：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执行任务时一般采取自主规划、自主调用技能工具、分步骤推进的动态推进方式。司法场景使用者应当具备审查智能体执行过程的基础知识与能力，对可能影响任务实质结果的中间过程进行密切监控和回溯审查，重点监控任务分解的步骤规划、分步推理逻辑、技能工具调用情况以及中间执行产物是否存在跳步骤、乱假设、漏要件、错逻辑等情形，同时关注被调用的技能工具和数据来源是否在授权范围内。

3. 介入异常节点：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一般允许使用者暂停执行并介入修正。司法场景使用者需要习得如何识别并介入异常节点的能力。当智能体出现可能影响任务实质结果的情形时，应当立即介入并通过重新定义任务、补充指令等方式进行修正。重点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关键上下文未能有效输入，可能导致生成幻觉的；引入错误法律前提、可能导致逻辑紊乱的；技能工具调用失败，可能导致执行失范的；试图访问未授权资源或数据，可能导致边界失守的；中间步骤的推理偏颇，与法官决策背离的。

例 3（示范）：法官委托智能体辅助完成“梳理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事实争议并关联证据”任务后，未直接查看结论，而是先检查任务的可见执行记录：一看材料读取记录，诉辩意见、庭审笔录、双方证据清单均已完整读入，无遗漏；二看步骤规划，智能体将任务分解为“逐项对应事实主张 - 归纳双方事实性分歧 - 证据逐项关联争议 - 对照庭审笔录检查是否遗漏”四步，与任务指令一致；三看技能工具调用，证据分析调用的是内置的案卷材料阅读工具而非来源不明的外部信息；四看中间结果，事实分歧点归纳未添加材料之外的事实。确认各环节对齐后，法官再进入输出核验。

例 4（纠偏）：法官委托智能体辅助归纳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争议焦点，思维链输出结果始终未涉及被告“已部分还款”的抗辩，与庭审情况明显不符。法官回查可见执行记录，发现材料读取记录中仅有起诉状与借据，被告提交的还款流水凭证因操作问题

未成功上传，智能体是在关键材料缺失的前提下完成的归纳。法官随即暂停任务、补充上传该组证据后重新运行，输出结果即完整覆盖双方主张。结果偏差的根源是输入缺失，这类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即可发现，无须等到输出环节。

（三）核验输出（Verify the Output）

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的结果既可能成为法官形成内心判断的参考依据，也可能成为后续释法说理的基础素材，因此必须坚持循证核查的审慎要求。尽管智能体的输出内容通常语言流畅、结构完整、表述自信，但这种外观上的专业性并不等于内容的准确性，必须按照最严标准防范幻觉生成、信息谬误、指令偏离等风险，使用者应当从法律依据、事实陈述、输出逻辑三个层面对输出进行分级循证核验。

1. 核实法律依据：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结果需引用法律条文的，即使系统已对接权威数据库核验并附加知识原文链接，仍不能替代人工复核。司法使用者对于智能体引用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应当逐一与权威法律数据库（如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等）进行交叉比对，尤其关注法条效力等技术问题。对于智能体“主动”引用的、指令中未明确要求的法律依据，更应当重点核查，并由法官本人作出是否可作为依据的判断。

2. 核实事实陈述：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结果中的依据信息通常已经过安全治理、输入框定和佐证校准，但治理不能穷尽风险，仍应重点关注偶发错误和执行偏颇。司法使用者对于智能体基于案件材料生成的事实摘要、争议焦点归纳等内容，应当与原始卷宗材料来源内容对照，以“人机协同”的方式确认智能体没有遗漏关键事实、混淆当事人主张、或添加原始材料中不存在的信息。

3. 核实输出逻辑：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的推理逻辑虽经定义任务、监督过程两阶段的精细控制，在输出环节仍须重点核查上述逻辑是否得到正确展示。即使法律依据和事实陈述都准确，智能体展示的分析过程仍可能存在逻辑跳跃、错误理解或隐藏假设。司法使用者应当关注的点包括但不限于：输出中列举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准确并可溯源至原文；输出中的分析结论是否与法官作出的各项决策相一致；仅从输出上看，结论是否确实从前提推导得出；在输出分析的逻辑中，是否存在偷换概念或以偏概全，对不同观点的分析是否均衡。

4. 分级循证核验：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既用在事务性、重复性工作中，也用在事实穿透、法律研究等实质任务中。因此，为兼顾质量与效率，并非所有输出的信息都需要同等程度的核查。对于格式化、程序性的辅助任务，如日期计算、文书格式调整、错别字校对等，仅需简要确认即可；对于涉及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裁判说理等实质性内容，必须逐项对照原始材料和知识库原文进行循证核查。

例 5（示范）：智能体完成一份合同解除纠纷的法律检索报告后，法官分三层核验输出：一核法律依据，对报告引用的每一处条文、司法解释，逐条打开所附权威数据库链接，比对条文内容与现行效力；二核事实陈述，将报告归纳的案件事实与卷宗原文对照，确认无遗漏、无混淆、无添加；三核输出逻辑，检查结论是否确实由前提推出、是否与法官已经作出的各项决策一致。其中期限计算等程序性内容仅作简要确认，拟用于释法说理的部分则逐项溯源。核验通过后，报告方作为参考依据使用。

例 6（纠偏）：智能体辅助完成对被告答辩意见的检查分析任务，输出结构完整、表述流畅，其中引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并附条文表述。法官逐条溯源时发现，报告转述的“条文内容”与权威数据库中该条原文不符，混入了已废止的《合同法》相应条款表述，查看溯源发现来源于被告答辩状。法官下达定向修正指令：“第二部分引用的条文表述与《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原文不一致，请对照权威数据库原文改正，并附原文链接。”

（四）驾驭环路（Harness the Loop）

在司法场景中，智能体任务的结果很难一次性满足所有精准性要求。多轮迭代并非智能体失效的表现，而是驾驭智能体的正常使用方式：使用者通过“运行—核验—修正—再运行”的环路，将初步结果逐步收敛为满足司法工作要求的精准结果。环路存在于两个层面：在单次任务之内，使用者通过定向纠错、重塑任务、校准口径逐步逼近任务目标；在跨任务层面，使用者通过沉淀经验持续提升驾驭效能。司法场景使用者应当掌握以下五项环路驾驭方法。

1. 定向纠正错误：发现输出存在具体错误的，应当明确指出错误位置、错误内容和修正要求，例如：“第③段引用的第 580 条有误，应为第 577 条，请修正。”每轮修正宜集中解决一处主要问题；同时调整多处，将难以判断修正是否见效；修正指令越具体，

改正越可靠。发现问题应当及时纠正，不必等待任务全部完成。

2. 重塑任务定义：输出方向正确、仅详略或细节不足的，通过追加指令继续修正；输出整体偏离目标或关键前提缺失的，不应在原有基础上反复修补，而应重新定义任务，并将已经发现的问题写入新任务的约束条件，例如：过于发散则收紧范围，如“不要泛泛检索，只看《民法典》合同相关条文。”材料噪声过多或不够聚焦的，补充或重新选定材料后重新运行，例如上传新证据或上级法院最新裁判后重新生成。

3. 校准输出口径：任务结果基本可用，但口径、体例或详略不符合工作要求的，通过明确工作标准进行校准，例如：“按本院再审审查标准重新梳理焦点。”并可进一步细化输出的口吻、体例与详略程度。

4. 掌握停止条件：环路迭代应当有明确的停止条件，避免无限度消耗核验精力。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迭代、转由人工办理：其一，同一错误经两轮定向修正仍然复现，表明任务已超出智能体当前能力边界；其二，任务涉及敏感、不可逆或对当事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无论迭代结果如何，均必须经人工审核后方可使用。停止迭代前，可以要求智能体对最终结果作一次自查（如“逐条核对本文书引用法条的现行效力”），但智能体的自查不能替代使用者本人的最终核验。

5. 沉淀使用经验：在跨任务层面，使用者应当将经过验证有效的任务定义方式、约束条件和核验要点，沉淀为个人或部门的指令模板，在同类任务中复用，持续降低任务定义成本、提高首轮输出质量。经验沉淀应当以任务方法为对象，不得将个案案件信息带入其他案件；涉及智能体记忆功能的，严格遵循按案件隔离、按任务清零的要求。

例 7（驾驭）：法官委托智能体检索某类再审案件的裁判口径，第一轮输出混入了不相关案由，法官收紧检索范围后重跑；第二轮输出仍将已被新司法解释取代的旧口径作为现行标准，法官明确指出错误并要求仅依据现行有效规范重新梳理；第三轮输出中同类错误再次出现。同一错误经两轮定向修正仍复现，说明任务已超出该智能体当前的能力边界，继续迭代只会消耗核验精力。法官停止环路，转为人工检索完成该项工作，并将问题情况反馈系统管理部门，等待系统管理部门的优化反馈。

附：《指南》实践基础与形成过程

自 2023 年起，深圳法院率先探索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稳慎融合，研发上线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并持续迭代升级。2026 年，升级实现“多智能体安全协同”的深度应用架构。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清华大学互联网司法研究院、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在深入调研深圳法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最新发展态势与司法应用特殊要求，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编制本《指南》，力求为司法领域规范、安全、有效地推进人工智能及智能体技术应用提供参考与指引。



附录 2 术语定义

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基于大量文本数据训练得到的大模型，以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为核心能力，能够完成文本生成、摘要、翻译、问答、推理等多种语言任务。大语言模型是当前智能体的主要智能底座。

幻觉（Hallucination）

大语言模型生成看似合理、实则不可靠内容的现象，如虚构不存在的法条、案例、文献或事实。幻觉源于大语言模型基于概率生成文本的技术原理，无法完全消除。在司法场景中，幻觉是核验输出环节必须重点防范的固有风险。

智能体（Agent）

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制定决策、采取行动实现特定目标的智能系统，一般具有记忆、规划、使用工具等基本能力。智能体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在司法语境下，特指为完成特定审判辅助任务而设计的智能化模块或系统。

智能工作流（Agentic Workflow）

将任务执行过程分解为多个预定义步骤，由大语言模型按照固定流程依次完成各步骤的工作模式。在智能工作流中，任务的分解逻辑和步骤顺序由系统开发者预先设定，模型在每一步骤内发挥智能能力，但不自主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术语定义

自主智能体（Autonomous Agent）

在智能体基础上，进一步具备自主进行任务规划、分步推理、动态调整执行策略能力的智能体。与智能工作流的关键区别在于：自主智能体可根据任务目标自行决定执行步骤和策略调整，而非依赖预定义流程。其“自主性”体现在为完成任务而动态制定策略与步骤的能力。

交互式思考（Interleaved Thinking）

大语言模型在生成输出内容的过程中，穿插进行推理、反思和规划的工作模式。模型在输出过程中可暂停生成，对已有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再决定下一步输出内容，而非一次性连续生成全部结果。

技能工具（Skill/Tool）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可调用的功能模块，包括法律数据库检索、文书格式处理、日期计算、信息比对等具体操作能力。技能工具通过标准化接口与智能体对接，由智能体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和调用。在不引起歧义时，技能工具可简称技能。

能力组件（Capability Component）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时可调用的各类能力单元的统称，涵盖技能工具、插件、外部接口以及子智能体等形态。技能工具是能力组件的主要形态；子智能体是以智能体形式存在的能力组件。能力组件的引入、认证与监控是智能体安全管理的重点环节。

术语定义

子智能体（Sub-agent）

由主智能体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派生或调用、用以完成特定子任务的智能体实例。子智能体具备智能体的一般能力，有自身的任务理解与执行过程，其行为边界和权限应当受主智能体任务范围的约束; 这也是其与技能工具的关键区别: 技能工具是被调用的功能模块，本身不具有决策过程。在多智能体协同场景下，子智能体的异常行为可能沿任务链路传导放大。

驾驭工程（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智能体构建约束、护栏、反馈回路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工具的工程方法，目标是使智能体在生产环境中持续产出正确、可审计、可维护的结果。驾驭工程的核心公式为“智能体 = 模型 + 驾驭框架”（Agent=Model+Harness）：模型提供推理能力，驾驭框架提供工具编排、安全护栏、错误恢复、可观测性与人工介入机制。在司法场景中，驾驭工程特别强调以司法业务思维方法牵引智能体的技术组合方式。

安全护栏（Guardrail）

针对大模型及智能体的安全控制措施，通过规则库、判别模型等技术手段，对输入输出内容、数据泄露、提示词攻击等进行识别、拦截和处置，限制其输出不符合预期的内容，保障生成内容的可控性、合规性和安全性。安全护栏是驾驭工程的核心组件，通常多层组合部署。

术语定义

安全沙箱（Sandbox）

为智能体执行任务提供的相互隔离的受控运行环境，将智能体的操作限制在授权范围之内，防止其访问未经授权的系统资源或对外部环境造成意外影响。安全沙箱与安全护栏的分工在于：安全沙箱在运行层隔离智能体行为的影响范围，安全护栏在内容层过滤智能体的输入与输出。

任务（Task）

使用者向智能体下达的、具有明确目标和预期产出的工作指令单元。一个任务通常包含任务目标、任务范围、技能要求和预期产出等要素。任务按照使用者参与方式分为预定义任务和个性指令任务两类：预定义任务的执行步骤和调用技能由系统开发者预先设定；个性指令任务由使用者自行描述需求，由智能体自主规划执行路径。

上下文（Context）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时所能获取和参照的全部信息，包括使用者提供的案件材料、任务指令、系统预置的知识信息、以及任务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中间结果。

指令（Instruction/Prompt）

使用者以自然语言向智能体描述任务要求的文本内容，是智能体理解任务目标、规划执行路径的主要依据。指令在技术文档中亦称提示词（prompt）。指令的完整性和精确度直接影响智能体的执行质量。

术语定义

越狱（Jailbreak）

通过角色扮演、编码绕过、多轮诱导等特定输入方式，诱使大语言模型或智能体无视其内置安全约束、做出本应拒绝行为的攻击手法，属于提示词注入攻击的一种形式。在司法场景中，越狱攻击可能借助递交材料、诱导提问、设置个性化参数等渠道实施，是安全护栏重点识别和拦截的对象。

记忆（Memory）

智能体存储、管理和检索信息的能力机制，使智能体能够保留和利用历史交互信息、任务经验和领域知识。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当前任务中的即时信息）和长期记忆（跨任务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在司法场景中，记忆机制的管控尤为重要：跨案件的记忆共享可能导致信息交叉污染，须按案件隔离、按任务清零。

环路（Loop）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重复进行“感知—推理—行动—反馈”循环的工作模式。环路存在于两个层面：内层环路为单次任务内的迭代循环（智能体反复调用工具、修正中间结果直至达到任务目标）；外层环路为跨任务层面的经验积累循环（使用者通过多次使用逐步优化指令和监督策略）。

附录3：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发展大事记(截至2026年8月)

2023年

5月

谋划启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建设。

明确“锚定辅助工具定位、深度融入审判环节、同步落实司法责任、全程确保数据安全”四项研发原则，确立“边研发、边试用、边完善”推进模式。

8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组建研发机制。

深圳法院组建人工智能辅助审判应用工程领导小组和推进办，采取“专兼结合”扁平化团队建制，开始研究具体应用规则、应用机理和需求设计。

11月

技术团队全面入驻现场，正式启动研发工作。

陆续组建15个业务研发小组和11个基层法院应用小组，与技术团队深度融合开展研发。

12月

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首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批示。

张军院长提出“不躺平、敢突围”的工作要求。同期完成研发阶段总结，部分功能模块接入测试环境。

2024年

1月

智能立案审查模块率先上线试运行。

覆盖473类民商事案由，辅助法官对35项立案标准逐一核查。

4月

完成全国首个司法审判垂直领域大模型训练。

基于人民法院出版社提供的包含知识图谱的万亿汉字量级法律语料，以及深圳法院组织制作的司法实务测评体系，完成全国首个司法审判垂直领域大模型训练。

5月11日

深圳市“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现场推进会召开。

深圳市“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现场推进会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陶永欣出席，会议向各主要市直单位介绍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

6月28日

★系统1.0版正式上线运行。

覆盖所有常见民商事审判案件（占审判案件总量90%），全国首个司法审判垂直领域大模型同步启用，实现人工智能对审判业务全链条赋能。新华社、央视网、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予以集中报道。

10月15日

★赵菊花院长在新加坡作专题发言。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菊花在第八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上作专题发言，分享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实践。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梅达顺表示希望2025年派代表团到深圳学习考察。

» 12月31日

★系统2.0版正式上线，实现三大诉讼全覆盖。

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2.0版正式上线，覆盖范围从民商事案件扩展至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领域全流程。系统1.0版上线半年，辅助阅卷15.2万件、辅助庭审6.3万场，深圳法院平均结案时间同比缩短38天，上诉率同比下降24%。

2025年

› 1月1日

新华社向全球发布英文专稿推介该系统。

新华社向全球发布英文专稿《China's local judicial systems embrace AI to improve efficiency》，专门推介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

› 1月2日

哈佛大学《法律分析杂志》发表专题论文。

哈佛大学《法律分析杂志》(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发表长达25页的专题文章《法官如何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自深圳的实证》，指出深圳法院是全球首个在司法领域全面、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的法院。

› 4月23日

入选2024年度深圳“十大法治事件”。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建设入选2024年度深圳“十大法治事件”。

› 8月

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算力应用样板点”。

合作周期为2025年8月至2027年8月，华为派驻团队开展算力终端工程设计和算子生态技术攻坚。

» 9月16日

★全国法院联合创新基地正式启动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推进智能化司法研发应用调研座谈会，全国法院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联合创新(深圳)基地正式启动运行，系全国唯一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创新基地。基地承担“一张网”智能化应用“实验室”和“评测场”职责。

› 11月2日

“鹏法天平杯”AI辅助审判应用技能竞赛决赛举办。

深圳法院联合深圳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全市法院4100余名干警参赛，创深圳技能大赛参赛人数最高纪录。

› 11月17日

中新法律圆桌会议在深圳召开，新加坡最高法院代表团访问深圳中院。

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观摩系统后评价：“这是我在所有法域中见过的最为惊艳的展示，系统非常先进且精密……这正是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2026年

1月22日

★二期工程正式启动，引入智能体技术。

人工智能辅助审判二期工程正式启动，引入智能体技术推动新版本研发。以劳动争议为试点案由，构建“智能体+技能工具”模式，计划覆盖90%常见案由。

3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肯定“深圳经验”。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张军院长在审议中肯定深圳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介绍最高法院已在11个省（区、市）的23家中级、基层法院开展试点运行，“效果非常好”。

4月21日

首个《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在深发布。

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清华大学互联网司法研究院、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联合编制，明确四项研发原则和四项负面清单。同日，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4月24日

★劳动案由智能体、通用智能体与个案智能体上线。

劳动案由智能体正式改版上线，包含相关案情总结、裁判要旨推送、文书生成引导等功能。劳动案由通用智能体上线，民商事全案由个案智能体同步上线，法官可在个案对话框中直接输入指令，智能体自动识别并调用对应技能。

4月27日

“从深圳向未来”演讲在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发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邝肖华在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发表“从深圳向未来”演讲，并介绍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上线一年多以来，深度赋能超过60万宗案件的审理。

5月16日

全案由通用智能体上线，覆盖民事、行政、刑事。

通用智能体扩展至全案由（含行政、刑事），个案智能体增加问知识、做研究、知识库功能。

6月5日

获得智能体安全能力评估证书。

深圳法院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智能体（V1.0）通过中国泰尔实验室（中国信通院）智能体安全能力评估，安全能力达到5级（最高级）。

6月13日

★行政、刑事个案智能体上线，实现全案由智能体覆盖。

行政、刑事个案智能体正式上线，至此个案智能体已覆盖三大诉讼领域等全部案由。

7月24日

★民商事7大案由“专属技能包”正式上线。

涵盖民间借贷纠纷等7类案由的一二审案件。上线证据摘要和评价、认定事实生成、计算信息提取及运算、争议焦点匹配裁判要旨、说理仿写5项核心技能。法官可在个案智能体对话框中直接输入指令，智能体自动识别并调用对应技能，或通过“技能”按钮获取精细化输出。